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16. 1

一年出版三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Abdie Kazemipur
谈社会学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 Shahrokni
Reyhaneh Javadi
Esmail Khalili
Zohreh Bayatrizi
Aghil Daghighaleh
Shiva Alinaqian
Nafiseh Azad
Maral Latifi
Mahbubeh Moqadam
Fatemeh Moghadasi
Ladan Rahbari

重构伊朗社会学

Karen Shire
Heidi Gottfried
Rina Agarwala
Ashwin Kumar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Carolina Moreno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
Javier A. Pineda D.
Lynn Yu Ling Ng
Yunhui Ye
Anju Mary Paul
Mustafa Yavas
Sejin Park
Feng Xu
Tsz Chung Lai

劳动迁移的
政治与社会经济学

议题开讲

> 战争作为纠缠的累积：加萨案例研究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6卷/第1期/2026.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编辑的话

本期《全球对话》迈入第 16 卷，迎来了一个既有传承、也有新意的新起点。在此，我们要感谢 Carolina Vestena 与 Vitória Rodriguez 过去三年的辛勤付出，他们的奉献精神、细腻的编辑与批判性视野，是杂志走过这段全球社会学动盪时期的关键力量。我谨代表编辑团队向两位致以最深切的感谢。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欢迎里斯本大学学院的研究员 Marcia Rangel Candido 加入。Marcia 拥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对公共社会学充满热情，也具有跨国比较的全球视野，必将为杂志带来深远贡献。

前一期特辑我们致敬了《全球对话》创刊编辑 Michael Burawoy 在思想、政治及人文遗产；本期则回归常规架构，直接回应形塑当前历史时刻的两大急切关怀：伊朗的现况以及劳工移民相关的全球转型。

本期以对话社会学专题揭开序幕，刊载了 Nazanin Shahrokni 对 Abdolmohammad (Abdie) Kazemipur 的专访。访谈反思了关于国家社会学的辩论、社会变迁、圣俗之际，以及当今形塑伊朗社会学的核心探问。

随后，是由 Nazanin Shahrokni 与 Reyhaneh Javadi 精心编辑的「再思伊朗社会学」专题。该专题聚焦于在政治压迫、思想审查与深刻的文化争议的环境下，进行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张力与悖论。从社会学的公共相关性、该领域的（飞）制度化问题，到教学的私有化、族群问题、性别研究的抗争以及批判性研究的种种限制，本专题对伊朗社会学今日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多维度的观察。此外，专题中还包含一场由散布各地的学者参与的动态圆桌会议，共同勾勒出关于伊朗及来自伊朗的知识生产图景。

当今伊朗再次成为全球头条——且往往被框架在选择性的叙事、地缘政治的简化或狭隘的安全视角中。在此时，与紮根、公共且具备全球视野的社会学观点接轨便显得至关重要。在主流媒体流传的影像之外，伊朗社会的特征是复杂的政治抗争、生机勃勃的学术传统、赌上尊严的日常奋斗，以及不断变化的国家权力与社会动员模式。要理解这些动态，就需要倾听那些在伊朗、针对伊朗、并与之合作的学者的声音，他们能够将当前事件置于压迫、反抗、知识生产与社会转型的更宏观的历史当中。尽管本专题并非致力于分析最近期的事件，但它极有助于提供一种更广泛并具有历史脉络的理解。

第二个主要专题为「劳动迁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学」，由 Karen A. Shire、Heidi Gottfried 与 Rina Agarwala 共同编辑。本专题探讨了我们的时代的一个核心议题：劳工移民在全球资本主义重组中的核心地位。从印度的「安全且有序」流动计画、到连结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的全球照护链，再到中国、新加坡、杜拜与柬埔寨的移工体系，这些文章展示了不平等、性别、族群、边境与国家权力如何交织，进而产生新型态的不稳定性，以及主体能动性反抗的新可能。

在议题开讲中，本期以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对加萨战争的深刻分析作为结尾。他将这场战争解读为一种纠缠式积累 (entangled accumulation)，其根源来自于远超战场以外的政治、经济与殖民动态。

透过本期内容，《全球对话》重申对于公众及全球社会学的承诺，致力于透过在地化、多元且对话性的视角来分析当代进程。我们希望能在此汇集的反思、辩论与研究，能在这个由不平等、暴力与流离失所形塑的世界中，拓宽对话、强化网路并开启新的探问同时，也为迈向更公正地未来的反抗、批害性想像与集体努力贡献力量。■

Breno Bringel, 《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发布于[官方网站](#)。

> 投稿请寄信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 Marcia Rangel Candido.

副编辑: Christopher Evans.

执行编辑: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区域编辑团队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亚)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Siwar Harrabi, Ahmed Jemaa.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Mohammed Jahir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Yasmin Sultana, Md. Shahidul Islam, Farheen Akter Bhuiyan, Ruma Parvin, Arifur Rahman, Md. Nasim Uddin,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Suraiya Akter, Nusanta Audri, Ekramul Kabir Rana, S. Md. Shah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兰: Aleksandra Biernacka,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 李宛儒, 周芸瑄, 郭志豪, 黄翊硕, 林韵柔, 吕道咏, 简芊楹, 廖宇雯, 李妮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在與Abdie Kazemipur的社会学谈话中, Nazanin Shahrokni 和他讨论形塑伊朗社会学那些不断演变的问题。



重构伊朗社会学则探讨在压迫环境、学术审查及文化冲突的情况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拉扯。



劳动迁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学的专栏中, 讨论劳动移民在重新组织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封面图片: Hans-Peter Gauster, 来自Unsplash。



Global Dialogue由SAGE赞助

> 目錄

编辑的话	2	> 劳动迁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学	
		劳动迁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学:	
		初步介绍	
		Karen Shire, 德国;	
		Heidi Gottfried 和 Rina Agarwala, 美国	30
		社会学领域对移民挑战的贡献	
		Rina Agarwala, 美国	33
		印度国家机器如何想像与落实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	
		Ashwin Kumar, 美国	35
		跨越国界的关怀:	
		移民至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女性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Carolina Moreno,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 和 Javier A. Pineda D., 哥伦比亚	37
		流动发展主义式的中国和新加坡移民照顾劳动力	
		Lynn Yu Ling Ng 和 Yunhui Ye, 加拿大	39
		杜拜对非西方外籍人士的独特吸引力	
		Anju Mary Paul, Mustafa Yavaş	
		和 Sejin Park,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41
		中国教育移民的本土、海外与归国历程	
		Feng Xu, 加拿大	43
		柬埔寨成衣业移工: 脆弱性与抗议	
		Tsz Chung Lai 和 Kaxton Si, 香港	46
		> 议题开讲	
		战争作为纠缠的累积: 加萨案例研究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巴西	48
> 社会学对话			
特殊性的拜物教, 与神圣世俗化:			
专访 Abdie Kazemipur			
Nazanin Shahrokni, 加拿大	5		
> 重构伊朗社会学			
在压迫与连结之间:			
透过伊朗视角重构社会学			
Nazanin Shahrokni 和 Reyhaneh Javadi, 加拿大	8		
伊朗社会学学会与			
非制度化的制度化之转变			
Esmail Khalili, 伊朗	11		
在政治与营利之间:			
伊朗的私人社会学课程			
Reyhaneh Javadi 和 Zohreh Bayatrizi, 伊朗	14		
伊朗的族群性: 当地社会学所回避的问题			
Aghil Daghighaleh, 美国	17		
处境中的生命与知识之争:			
重夺伊朗性别研究			
Shiva Alinaqian, 伊朗	20		
重重限制下的伊朗社会学研究: 圆桌论坛			
与谈人: Nafiseh Azad, Maral Latifi 和 Fatemeh			
Moghadasi, 伊朗; Mahbubeh Moqadam, 美国;			
Ladan Rahbari, 荷兰; Reza Sohrabi, Nazanin Shahrokni			
和 Reyhaneh Javadi, 加拿大	22		

「虽然国家或区域社会学理所当然地去挑战主流典范, 但它们也可能复制了自己所反对的排他性——例如将特定脉络本质化, 或仅仅是以一种普世性取代了原有的普世性。」

Abdie Kazemipur

＞ 特殊性的拜物教，与神圣世俗

专访 Abdie Kazemipur



| 图片来源：Abdie Kazemipur。

近年来，关于全球社会学知识生产动态的辩论愈发激烈，大众对于「国家社会学」、「南方理论」及「区域传统」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伊朗为这些讨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如本篇访谈中与 Abdol-mohammad (Abdie) Kazemipur 教授所探讨的内容。Kazemipur 教授目前担任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学教授暨族群研究系主任，并曾任加拿大社会学学会会长。他近期的研究探讨了现代伊朗境内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以及移民如何重塑其社会地景。在这场广泛的对谈中，Kazemipur 教授反思了伊朗社会学的现状——包括其面临挑战、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对「植根在地、接轨全球」学科特质的追求。本次访谈由西门菲莎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 Nazanin Shahrokni 主持。

Nazanin Shahrokni (NS): 许多社会学家都曾挑战「普世」社会的概念，指出长期以来被视为普世的理论，实际上是根植于欧美经验的特殊传统。为了回应这点，学界转向「特殊性」——透过国家社会学、区域方法论以及南方理论，试图将另类的认识论推向前景。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向？在伊朗语境下谈论「国家社会学」又意味着什么？

Abdie Kazemipur (AK): 我认为这种区分无论在描述层面或规范层面上都存在问题。虽然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确实能够挑战主流典范，但它们也可能重蹈自己所反对的复沓——例如将特定情境本质化，或仅是用另一种普世主义取代原有的。如今反对普世主义已无争议，但我们却面临陷入一种新「特殊性拜物教 (fetishism of the particular)」的风险。

首先，每个「特殊性」内部都包含多样性。声称能代表其所有子范畴，其实是重蹈了普世主义的复辙。例如伊朗与土耳其（皆未被直接殖民）就无法轻易地与阿尔及利亚、印度或埃及等前殖民地归为一类；正如 Sari Hanafi 所言，即便在阿拉伯中东地区，东部与西部也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其次，将「国家社会学」或南方理论主要框架为对北方典范的反抗，往往更服务于以身分为中心的政治目标，而非认识论目标。这会推举出一些象征性人物，但其革命吸引力会随着时间消逝。例如，Raewyn Connell 将 Ali Shari'ati 视为 1979 年革命前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关键声音；然而，他的思想影响力在革命后迅速降低，这说明身份主张或许能在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作用，但对于社会学知识的持续发展贡献甚微。

>>

NS: 既然您对「特殊性拜物教」有所顾虑, 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彻底放弃「国家社会学」的概念? 像「伊朗社会学」这类概念在分析上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还是说它反而可能强化了其试图克服的认识论鸿沟?

AK: 「国家社会学」确实存在, 也应该存在, 但不应作为理论的封闭领域(enclaves)。其价值并不在于主张拥有独特的理论或方法, 而在于提出植根于该社会具体情境的独特问题。「好的」社会学始于定义明确且具有在地性的问题; 而要回答这些问题, 则需要动用所有可用的智识资源——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而不应预设排斥任何一方。这类解答产生于思想与现实之间长期的协商过程, 以及跨学术传统的交流。因此, 我们应实践「理论不可知论」与「折衷主义」——拥抱来自多元传统的概念, 而非将特定理论神圣化或弃如敝屣。

NS: 让我追问两个问题。您认为国家社会学的价值在于提出的「问题」, 而非推进「独特理论」。但正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 并不存在所谓的中立立场: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受到我们所拥有的概念工具与分析视角的制约。主流典范甚至可能预先排除了某些问题被提出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家或地区社会学不仅仅是关于提出在地问题, 也关乎发展出替代性框架, 好像新型态的探究成为可能。您对此会如何回应?

AK: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 但我认为这种制约是双向的。正如所谓的「普世主义」视角可能会限制我们提问的能力, 同样的, 「在地」视角也可能预先排除了其他的探究路径。这种紧张关系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尤为明显。虽然全球北方某些女性主义流派的普世立场, 常使他们对南方涌现的另类问题与理论可能视而不见; 但事实上, 南方许多女性主义意识, 也正是透过参与根植于北方的女性主义议程才得以成形。这正是为什么跨视角、持续且积极的对话至关重要。

NS: 延续刚刚提到的观点, 既然您强调国家社会学是通过其所提出的问题而形成的, 那么能否谈谈过去数十年, 有哪些问题与主题定义了伊朗社会学?

AK: 伊朗社会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变化, 这些变化形塑了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 革命前时期由国家主导的快速现代化和世俗化; 1979 年伊斯兰革命期间, 宗教势力意外崛起成为强大的政治与个人力量, 并动员了大约 10% 的人口; 以及两伊战争: 这是 20 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近几十年来, 我们见证了世俗化的双重进程: 其一是彻底摒弃宗教, 或转而拥抱一种去机构化、去仪式化、且摆脱圣职阶级与神学束缚的个人化灵性; 其二则是一种使宗教从属于国家的世俗主义型态, 这是两者在激进的伊斯兰化浪潮下强行合流后, 所导致的非预期后果。

伊朗亦具有独特的移民轮廓: 它同时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国, 也是主要的移民接收国。该国接纳了约 450 万难民(约占总人口的 5%), 同时约有 800 万伊朗人生活在海外(约占总人口的 9%)。调查显示, 若条件允许, 超过半数的国民渴望移民, 这使得伊朗成为同时研究「移出」与「移入」现象的罕见案例。

最后, 为了回应体制性的性别不平等与文化父权, 一场强大且真实的女性运动应运而生, 重塑了该国社会运动的本质、规模与诉求。这些有趣且相互交织的动态——包含意识形态转向、宗教变革、战争、移民以及性别问题——激发了伊朗国内及海外社群蓬勃的社会学研究, 特别是在移民、身份认同、性别和社会资本等领域。

NS: 在这样动盪的历史背景下, 您认为当今伊朗社会学成长的最重大障碍是什么? 这些挑战又是如何影响了哪些问题可以或不可以被提出?

AK: 最大的挑战在于政府对研究自由的打压。研究社会问题的领军人物 Saeed Madani 博士目前仍身陷囹圄; 旅居法国的人类学家 Fariba Adelkhan 博士在获释前也曾入狱数年。还有许多学者被开除教职, 即便如此, 他们仍持续产出卓越的作品。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 国家与「政治」在伊朗人(包括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认知中始终佔据首位。这种对政治的高度关注, 往往掩盖了「社会」本身, 限制了提问的类型与分析方向。其具体体现在, 当国家无法或不愿发挥预期功能的情况下, 针对社群赋权或在地倡议的研究却极为匮乏。

另一个障碍源于一种双重弊病: 一方面是对理论的过度迷恋——近乎拜物教的地步; 另一方面则是缺乏理论导引的经验研究, 即 C. Wright Mills 所称的「抽象经验论(abstract empiricism)」。伊朗社会学需要更多以理论为导向、且兼具在地紮根与严谨概念的实证研究。

最后, 伊朗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仍与全球社会学及比较研究脱节——即便与土耳其、埃及和沙乌地阿拉伯等在区域或历史上具备可比性的语境, 也缺乏对话。

话虽如此，新的机制正在将伊朗社会学与更广泛的学术讨论联结起来。一群常驻海外、通常为第二代移民的年轻社会学者，为伊朗社会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好奇心。尽管他们的著作偶尔被浪漫化，但在向全球受众转译伊朗社会现实、并提升该领域的国际能见度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方面是伊朗国内蓬勃发展的翻译运动，它以惊人的速度将古典与当代社会学著作翻译成波斯语。这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学术讨论，并使伊朗学者能够接触到全球的讨论——尽管目前多是接收，而非贡献。

NS：这种翻译运动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它也反映出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对称性：翻译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单向的。在伊朗境外产出的著作——尤其是以英语形式创作的——会被翻译成波斯语，但极少有以波斯语创作的社会学著作被翻译往海外；而且在伊朗国内，对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库德语或其他地区的社会学著作的传播也很有限。这种语言和认识论的失衡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您如何看待伊朗在全球南方社会学，特别是在中东社会学的版图里，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AK：你说得对，这种单向流动对伊朗社会学并不健康。伊朗的社会学学会应致力于与区域内的同行建立更具系统性、常态性的联系，这点对双方都有利。

正如 Michael Burawoy 所言，国家社会学一如个人认同，是在关系中形成的，并透过与他者的互动来理解自身。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不能再将特定的事物——无论是美国或法国、男性或殖民者——投射为普世标准。但我们也不能陷入孤立的特殊主义的泥淖之中。全球社会学必须建立在不同特色、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

借用 Michel Foucault 的一句评论：社会学的未来存在于相遇的空间——在那些欧洲与非欧洲、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以及各个区域内部多元的交汇并相互扰动的空间。伊朗社会学对这样的未来的贡献，取决于能否培养出一门根植于真实、且具备特定情境问题的学科：既不受困于进口的理论模型，也不沦为国家例外主义。■

来信寄至：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_shahrokni@sfu.ca>

> 在压迫与连结之间： 透过伊朗视角 重构社会学

Nazanin Shahrokni,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加拿大;
Reyhaneh Javadi, University of Alberta, 加拿大



伊朗的社会学知识生产正面临困境，而这场研讨会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中诞生。伊朗社会学中的长期论辩，正是关于自身究竟应该在公共议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批判者、社会危机的诊断工具，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解者。如今，这些讨论的舞台却大幅缩减。政治压迫、支离破碎的公共领域封杀学术异见、经济困境、全球制裁，以及严苛的移动与签证制度，共同削弱并动摇了曾经支撑伊朗社会学的体制与智识空间。大学在日益严苛的政治条件下运作，研究经费匮乏，国际合作也更加困难。然而，学者们仍持续分析、纪录并参与于伊朗的社会变迁当中，为伊朗社会学提供坚实的地基，促使其存续。

本次研讨会的筹备期间，这片土地的动盪局势已令人无法忽视。伊朗历经的一系列危机，彰显了学术生活与知识生产的脆弱性。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为期十二天的战争，打击了该国境内的军事及民用基础设施。数月后，2026年1月抗争爆发，却遭到国家的残酷镇压，数千名平民丧生。伊朗社会学协会指出，这些抗争与国家的暴力回应，既非前所未有、亦非难以预料。协会警告，常态化的暴力威胁了社会团结与人类尊严。这使得

社会学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危机的纪录、其结构性根源的解读，以及关于未来的公共对话之维系，都仰赖社会学作为手段。

更糟的是，上述的艰困处境仍进一步恶化。本次研讨会的相关出版品送印之时，美以两国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再次于全国各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夺走平民性命。受害者包括超过100名未满12岁的女学生，她们在南部小城 Minab 一所小学中遭受袭击。这些轰炸摧毁了基础设施，使得本就脆弱的制度环境更加恶化，并危及几代伊朗社会科学家费尽心血建立与维系的学术根基。

上述现象恰恰反映出的，正是伊朗社会学在如此环境中的必要性。学者们面临多方压力——国内的限制了学术自主权与公共辩论，而外部的军事与经济胁迫则进一步动摇了学术生活所依赖的制度根基。因此，本次研讨会不仅探讨伊朗社会，更反思社会学本身必须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持续发展并发声。

> 多次受袭的伊朗国内外学者和基础设施

这些条件的脆弱性，也能反映在伊朗社会学学会（ISA）的「物理生存状态」之下。学会位于德黑兰大学的官方办公室，长期暴露在国家规管的审查之下，使学会不断承受着针对其自主性的种种压迫。学会为争取独立且永久性的办公据点而进行的努力陷入停滞，这进一步体现了社会学与公共生活的全面萎缩。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众多学者、翻译人员及研究者被连番逮捕的事件，不仅是个人遭到摧毁，支撑着批判性思维的基础设施也一同面临瓦解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社会学工作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这些压力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社会学长期被视为在意识形

>>

态上极其可疑，并反复遭受伊斯兰化、学科「清洗 (Cleansing)」以及持续不断的安全化管理。

这些矛盾延伸到了伊朗国境之外。伊朗裔美国学者及其他离散学者，在伊朗与西方学术机构中皆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监控与移动限制；他们在彼此重叠的安全逻辑框架下艰难地穿梭，这些逻辑限制了他们的旅行与合作研究。在伊朗境内，这种带有怀疑色彩的社会学氛围在境外也愈发明显。

> 意料之外的韧性

然而，这些压力与意义深远的转变并行不悖。2025年 Shirin Ahmadnia 博士当选为伊朗社会学学会首位女性主席，这个事件引发了强烈回响，这标志着对于女性社会学劳动迟来的认可，同时也开启了重构一个在历史上由男性主导之体制空间的可能性——尤其在当前，社会学这门学科主要由女性学生支撑。这场选举发生在体制岌岌可危之际，这本身就极具意义：即便结构日趋衰微，对能见度与发言权的新诉求依然不断涌现。正是在这种紧张局势之下，伊朗社会学磨练出惊人的韧性，从校园内部到私人研究机构，从读书会到离散网路，师生们正合力为思想与辩论拓殖出新的腹地。

> 本专题目标与启发式指南

本专题的核心目标有二：首先，它旨在彰显伊朗社会学所蕴涵的学术活力 (Intellectual vitality)，并揭示形塑其研究实践的种种阻碍；其次，它将这些辩论拉升至全球层次，在权力分布不均的地缘政治中，重新定位社会学。作为一项具有启发性的指南，我们提出「在伊朗的社会学 (Sociology in Iran)」与「关于伊朗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Iran)」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并不是要划定地理疆界，而是试图指出，形塑该领域的认识论、方法论与政治上的种种裂隙 (Fissures)，与其所描绘出的当前地景。

> 在伊朗的社会学与关于伊朗的社会学： 跨脉络的流动

所谓「在伊朗的社会学」，指的是在伊朗的大学、学会、私人研究机构以及非正式的学术网路中，所形成的多元专业、教学与研究实践。这不仅包括社会学知识的产出，也涵盖了透过蓬勃发展的翻译产业、公开讲座、工作坊，以及在体制外支撑着社会学参与的半独立教学空间来传播知识。这些实践是在资讯审查、监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紧缩以及国际机构门槛——包含语言、名誉与地缘政治障碍——等条件下开展的。这些限制使得批判性研究充满风险且发展不均，却也催生出各种跃鱼协作、教学和公共辩论的创新策略。

所谓「关于伊朗的社会学」，指的则是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产出的，旨在理解伊朗——包含其社会组成、历史脉络与政治经济学——的整套学术体系。这类研究大多在全球学术框架下流动，并受到主流学科受众对其「合理性」的期待所形塑。尽管这些压力促进了更广泛的国际能见度与辩论，却也可能边缘化了那些源于伊朗内部的、特有的概念、议题的优先顺序与特定的知识语汇。

至关重要的是，这两种取向并非固定不变的范畴或对立的类别。尽管存在政治与制度上的阻碍，思想、档案与方法论的敏锐触觉依然在国境间流动。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常于这些立场之间转换，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则会受到不断变动的资源获取管道、所受的限制以及受众的转变所交织的情境所影响。

> 举世猜疑与制裁枷锁

然而，在能见度、资源与体制认可方面，依然存在显着的不对称性。伊朗境内的研究者必须与审查、监管以及物质匮乏搏斗；而身处境外的研究者，则面临制裁体制、签证限制，以及西方学术机构的规训凝视。对许多离散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两地都陷入了被猜疑的处境——在伊朗受到监控，在北美与欧洲则受到严审——这都在实质层面影响了他们能够研究、撰写、分享哪些内容。

地缘政治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断裂。美国的制裁使得身处伊朗的学者处境艰难，有时甚至完全无法参与全球学术网路、缴纳专业学会会费或参加国际会议。伊朗社会学曾是公共辩论的重要平台，如今却在经济压力与制度压力下，连维持基本运作都举步维艰。这些排除不仅限制了伊朗社会学的发展，也损害了全球社会学的完整性，使那些来自受到制裁、监控与结构性边缘化的声音被消音，甚至让这样的「缺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 认识论、方法论与体制性的重压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从多个角度切入了一些困境。有些文章探讨了社会学实践背后的制度条件；有些则深入探讨基本的认识论问题；而与 Abdolmohammad Kazemipur 的访谈，则将伊朗的辩论置于更广泛的理论反思中，探讨特殊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关系。

Aghil Daghighaleh 与 Shiva Alinaqian 的文章追溯了关于族群和性别方面的认识论空白，揭示了一个由性别、族群和阶级制度交织形塑的规范中心，如何长期以来支配着伊朗社会学，导致边缘叙事与女性主义被迫边缘化，甚至遭受质疑。这样

>>

的排除不仅只在智识层面，也体现在制度中。正如 Esmail Khalili 所指出的，伊朗社会学协会体现了一种「去体制化的体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on-institutionalization)」：这是一种特殊的组织状态，即不断地将社会学体制化的过程中，也持续对其造成破坏。他的分析凸显了一种悖论：尽管该领域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建立持久的体制形式，但这些努力却是在一个限制实质自主性的环境中进行，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它们试图克服的限制。类似的紧张关系也出现在关于私有化的研究中：Reyhaneh Javadi 与 Zohreh Bayatrizi 证明了社会学的私有化最初被期待能够弥补学术自主性的缺失，结果却反而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商品化逻辑，将教育转化为一种学位资格认证的市场，而非公共财。

在题为「重重限制下的伊朗社会学研究」的圆桌会议中，与会者对方法论困境的讨论，将前述分析延伸到了研究的日常实践中。从田野调查的种种限制、模糊不清的伦理审查制度，到被刑事定罪的威胁，与会者皆是了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是在研究伊朗的离散地与学术机构中——不仅形塑了哪些议题能被研究，也决定了哪些资料能被收集、存档与传播。

➤ 新兴的转型实践与创新的参与模式

然而，本专题研讨会也凸显了在限制之中、以及对抗限制所开创的种种可能性。尽管在官方体制内遭到边缘化，女性主义学者仍持续对性别、宗教和国家权力进行深刻的分析。关于族群的研究则挑战了国族主义的正统观念，强调必须将族群差异置于国家形成、主权运作以及日常抵抗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尽管伊朗社会学学会面临不稳定，且必须仰赖公立大学或地方政府善意支持的窘境，但它仍持续为会议、出版品及面向公众的活动提供平台。此外，私人 and 半私人的社会学课堂也催生出了混合型的教学空间，在抵抗与新自由主义再生产之间摆盪。在这些脉络底下，社会学家们成功将限制转化为方法论与概念上的创新。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贡献描绘出了一片既充满复杂、多尺度限制，又并存着多元且创新参与模式的地景。它们展现了社会学领域如何透过结构性压力，与学者们所采取的灵活机智的实践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断获得重构；学者们得以坚忍生存、灵活适应并积极参与其中。

➤ 迈向与伊朗同在的社会学

本专题研讨会的目的不在于全面绘制伊朗社会学的地图，而是将这些压力置于更广泛的学门问题框架之中进行审视。「在伊朗」与「关于伊朗」的研究所面临的种种不稳定性，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共

同命运：在权威治理、市场压力与全球知识网路的不平等参与中奋斗。透过汇集这些论点，我们不只是在纪录这些挑战，也希望邀请读者思考：这些经验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学学门提供了什么样的概念与方法论上的启发。就此而言，伊朗社会学的故事，便成了社会学本身的故事：关于它的局限性、它的可能性，以及它为了对其所根植的社会负责，而持续进行的奋斗。

因此，我们提出的是一种与伊朗同在的社会学姿态：这是一种根植于协作、互惠和反身性的参与模式。这种取向并非要消解「在伊朗」与「关于伊朗」社会学之间的张力，而是坚持在两者的交织与跨越中进行探索。它主张伊朗社会学绝非处于全球学术的边陲，而是处于核心位置。它不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全球发展路径，更挑战了长期以来主宰知识生产与流动的排除性体制。

这种立场拒绝将伊朗社会学仅仅视为一个「案例」，或受到外部检视的「客体」。相反的，它肯定了伊朗社会学家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在体制中的奋斗与方法论上的创新，这些都是对广义社会学的重要贡献。在当下伊朗的声音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国际论坛之外的时刻，建立一套「与伊朗同在」的社会学，既是迫切必要的，也是维护学科正义的使命。■

来信寄至：

Nazanin Shahrokni <nazanin_shahrokni@sfu.ca>

Reyhaneh Javadi <javadi1@ualberta.ca>

> 伊朗社会学学会与非制度化的制度化之转变

Esmail Khalili, 公民与社会文化研究所前成员, 伊朗社会学学会副主席 (2021-2025), 伊朗



第六届伊朗社会概念与批判性反思会议, 2025年9月。图片来源: Mohadeseh Ghazvini。

1934年, 随着德黑兰大学的成立, 社会学进入了伊朗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当时, 毕业于索邦大学的 Gholamhossein Sadighi 于 1940 年开始在该校教授社会学。在发展初期, 伊朗的社会学是一个规模较小且精英化的领域, 深受法国知识体系的影响, 并与巴勒维王朝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工程紧密挂钩。当时, 这门学科主要在德黑兰的学术精英圈内孕育, 体制影响力有限, 专业社群也相对狭小。

1979 年的革命以及随后于 1980 至 1983 年间开展的文化革命, 为学术界带来了变革与扩张。新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对大学理系进行了彻底的改组: 开除被视为意识形态上可疑的教职员、关闭大学以进行整顿, 并将意识形态审查纳入学术生活的每个阶段。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 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整个学术思潮被肃清, 课程大纲也被改写, 以伊斯兰教义与革命精神为核心准则。

矛盾的是,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两伊战争结束后的战后重建期, 伊朗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 社会学的招生人数也大幅增加。然而, 该学科在制度上的增长, 却深植于食利国

家 (rentier state) 的官僚与意识形态体制之中。职位晋升、研究经费和系所的人事任命, 与其说是取决于学术自主性或学术成就, 不如说受制于政治忠诚度、人际网路及对官僚体制的顺从。尽管社会学系与学生的人数激增, 但学术生活的品质, 却始终受困于「形式上的扩张」与「意识形态监控」的夹缝之中。

> 官僚顺下的多样化主流, 与异质并起的学术边缘

在这种后革命时代的背景下, 伊朗社会学变得日益分化。意识形态筛选、官僚形式主义, 以及食利型大学 (rentier university) 的声望经济 (prestige economy) 交织作用, 形塑出一个内部位置各异、有时甚至截然对立的专业领域。有些学者透过与官方意识形态挂勾的利益输送管道 (rentier channels) 进入该领域, 将政治忠诚转化为权力资本, 在寡头是的学术网路中佔据管理职。另一些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坚定, 但是出于务实利益的考量, 依然担任了官僚角色, 试图在体制的现行规则中寻求保障与晋升。

此外, 还有一些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徒——无论是宗教、左派还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将自己置于大



学主流之外，将重心放在政治主张的宣示，而非持续的实证研究。而在学术核心全之外，许多在 1980 年代的大清算中被开除的独立研究者，尽管缺乏正式的体制头衔，仍持续产出具有长远学术价值的作品。

「大学边缘群体」包括那些任职于研究机构或科研机构的人员，他们通常透过公开讲座、出版品和线上论坛与更广泛的受众接触。此外，还出现了一体制外的青年学者——其中有些人因法规限制而无法进入学术界，另一些人则是主动选择回避，他们仍与全球重要的学术思潮持续对话。伊朗的离散者则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是在伊朗受训但因政治禁令而无法回国的人，二是在海外出生长大、但其学术研究仍与伊朗社会紧密相关的人。最后，还有一群「身分追求者 (identity seekers)」：对这些毕业生而言，社会学与其说是一项持续的学术追求，不如说是一种获取个人或象征性认同的方式——它提供的是认可、地位或归属感，而非持续性的学术贡献。」

> 历史遗产

这种层次分明且破碎的专业地景，早在伊朗社会学学会成立之前便已存在，却决定性地型塑了该学会的文化与内部政治。从官僚式的效忠到激进的独立、从全球性的学术交流到纯粹的个人认同，这些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并存于世，使伊朗社会学学会的组织生活同时显德多元性而紧张。

这些历史遗产为一种可称为「非制度化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on-institutionalization)」现象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文化中，学术活力的表象，往往比实质性的知识生产更重要。

>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

若以正式基准衡量，伊朗社会学学会在制度化的进程中已取得显着进展：会员人数持续增加、年度会议规模不断扩张，且在公众辩论中的能见度也日益提升。学会迈向专业组织体制化的关键一步始于 1991 年。当时，十七位主要受训于欧美的伊朗社会学家共同创立了该学会。在发展初期，学会建立了更结构化的内部组织；除了行政（例如日益完善的会议筹办与刊物出版）外，它还设立了对应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工作小组。然而，其中许多小组的运作，至今仍缺乏明确的重点或目标。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可被称为「非制度化的制度化」的悖论。科学学会的运作，往往更注重形式而非实质：透过研讨会、工作坊和会议来「展演」知识生产，成为了衡量正当性的标准，而真正

具有洞见的产出反而退居次要。就此意义而言，他律性的成形不仅仅是透过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更体现于那些模拟智力劳动之实践的常规化——这些实践模拟了劳动过程，却未必能产出实质成果。

> 从整合巩固到惯例僵化

从 2000 年到 2015 年之间是一个相对稳定与整合的时期，伊朗社会学学会在此期间确立了其学术与社会信誉。然而，随后的几年迎来了世代的大换血：许多资深学者不再积极参与，而新进学者——往往在受限的学术环境中摸索——则面临系统性培训不足、难以融入专业网路的困境。尽管量化增长仍在持续，学会的学术核心却趋于衰弱。在稳定期所建立的体制规范与例行公事变得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曾经有效、如今却对变革产生抗性的认同状态。

伊朗社会学学会早期的组织蓝图，与其说具备明确的规划，不如说更仰赖的是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即创会成员间非正式的习惯与假设。该学会并未依据伊朗的实际情况发展出相应的结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欧美专业协会的外在形式。这种模仿虽然让学会看起来像是个正式组织，实际上却缺乏能够稳固形成组织身份的反思性调整或成文规范。结果导致学会至今依旧缺乏阐明其学术使命、伦理与科学准则以及长期愿景的基础资料。与学术生活核心议题相关的讨论——如民主化、组织伦理或各工作小组间的分工——始终未能成熟发展。

由于缺乏成文规范，伊朗社会学学会的运作长期依赖不成文惯例与个人化决策。与其说是一个现代体制，不如说更像一种混合体：虽具备正式组织的外壳，却缺乏制度长久存续所需的反思性自觉 (reflexive self-understanding)。这种「制度化进程中的非制度化」在其民主程序中清晰可见：成员极少针对学会的发展方向进行实质的讨论，学会本身也未被成员们广泛性地视为一个集体的学术与组织志业。

> 声望重于学术严谨与专业责任

与此同时，学会内部也充满了各种矛盾。伊朗社会学学会虽然表面上遵循组织活动的各种常规程序——如开研讨会、办选举、出版刊物——但这些往往只剩下形式，而无法真正实践一个学术团体该有的核心目标。与其针对理论、方法或研究的先后顺序进行匝时的专业辩论，他们反而把竞争的力气都花在对声望、能见度与身分认同的追求上。近年来，激进主义与对于身份认同的追求的冲动变得更明显了，这虽然让学会在社会上更出名、更有能见度，但有时却掩盖了最根本、也最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专业体制。

>>

这些动态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名誉地位以及学术体制这三条战线展开。首先，早期成员背景相近，意识形态的分歧还不明显，如今却越来越严峻，还常跟激进主义或身份政治相互重叠。其次，基于名誉的竞争则反映出伊朗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追求领导职位往往是为了获取更多象征资本，而不是为了承担学术责任。最后，学术体制的发展极为不足：尽管研讨会与会议频繁，但学会内鲜少能看到真正的科学竞争的迹象——亦即缺乏针对理论、方法论或研究议程的辩论，而这类竞争本来应该能够推动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学术社群。

这些模式并不仅限于内部动态，而是受到伊朗大学体系自身结构性缺陷的强化：包括学会成立前不均等的学术素养、大学内部有限的导师制度，以及食利逻辑与寡头学术派系的支配。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呈现出一个学会的悖论：它在形式上存在、具备公众能见度且在规模不断扩大，但它始终难以巩固持久的学术与制度基础。这让它未来的发展轨迹依旧是个未知数。

＞ 未来前景

在伊朗社会学学会的种种体制模糊之中，转型的契机正逐渐浮现出来。有一群数量虽小但去不断在增加的批判性学者，他们往往没有前辈所享有的特权，却深耕于全球批判性思想，抵制以身份为导向的名誉追求，并力求在主流霸权之外建构独立的学术主体。他们的承诺植根于民主实践、知识多元主义与对体制的反思之中，虽然在学会的主流文化中仍处于边缘，但这些努力无疑标志着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若要使这些思潮得以稳固发展，还需要几个相互支撑的重要元素：首先是民主制度，用于将异质性转化为讨论而非派系斗争；其次是多元主义，以确保各工作小组能够反映多样的观点；再者是运作自主，使这些小组能够自主制定实质性的研究议程；最后是定期会议的连续性，且这些会议应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而非受基于身份认同或名誉导向的议程所主导。现在，研讨会论文逐渐转向以问题导向，这显示改革与超越会议本身的长期合作的机会正逐渐到来。

＞ 前方的挑战

今日的伊朗社会学学会所映照出的、重重堆叠的历史遗产，包括革命前带有精英色彩，且受外国影响的社会学；1980 年代的意识形态断裂与清洗；战后数十年的食利官僚体制的扩张；以及当前日益破碎的学术文化。这段历史为学会留下了生命力与波动性并存的局面：其成员基础广泛，包含官僚主义的拥护者、独立知识分子以及积极参与全球

对话的批判性学者；然而，学会至今仍缺乏一套成文的自我认知体系，亦未建立起持续进行民主辩论的文化传统。

学会未来面临的挑战不在于数量上的增长或公众能见度，而是在于培养出一套习惯与规范，让学会不再只是各个派系的总和。换句话说，我们的任务在于跨越「有形无质」的悖论：将展演转化为实践，将表象转化为真正的学术成果。倘若伊朗社会学学会能紮根于多元主义、民主审议与学术自主，其异质性或可转化为集体力量的泉源。若无此种转型，它可能会只停留于形式，而无任何实质：外表看来团结，内里却支离破碎。它所选择的发展路径，将决定伊朗社会学集体未来的新篇章。■

来信寄至：

Esmail Khalili <esmaeil.khalili@gmail.com>

> 在政治与营利之间： 伊朗的私人社会学课程

Reyhaneh Javadi 和 Zohreh Bayatrizi, 亚伯达大学, 加拿大。



招牌上写着「德黑兰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在这张2009年的影像中，旧有的招牌静静地放在教职员庭院的一角，靠在一扇受损的大门上。
图片来源：Reyhaneh Javadi。

长久以来，来自国内外的政经力量形塑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方向，往往带来利弊参半的影响。近几十年来，资金短缺、新自由主义的经费补助模式，加上教学与研究日益政治化，迫使各国大学必须优先发展职业导向的训练，并配合国家或私部门的目标发展研究方向。在教育层面上，微型证书（micro-credentialism）、大型开放线上课程（MOOCs）以及证照导向等教育模式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回应这些更广泛的政经压力；这也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削弱了正规的课堂教育，并导致许多教育与学术探究领域面临贬值危机。

这些更宏观的趋势，有时会颠覆、有时则会巩固在地脉络中既有的动态关系。以本文关注的伊朗而



言, 政治审查、经费短缺, 加上将意识形态置于学术专业之上的聘用制度, 长久以来限制着社会学的教学。另一方面, 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 学生发起的倡议行动便不断争取更高品质的教育与思想交流的自由。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读书会, 讨论热门或被禁止谈论的议题, 并与遭到政治边缘化的学者共同开设私人课程。随着时间推移, 民间也逐渐出现了私人的付费课程, 以弥补大学体制内的教学品质落差, 并提供替代的教育平台。

本文将探讨伊朗的私人社会学课程, 分析其起源、结构、参与者、教学品质的评价, 以及更广泛的政治与学术意涵。我们主张, 这些课程体现了学术界中商品化与抵抗的双重动态。本研究结合了多种研究方法, 包含档案研究、网路资料搜集, 以及半结构式访谈。我们一共访问了来自8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私人机构中的28位学生与讲师。我们的研究显示, 尽管其中某些现象是伊朗所特有的, 但在某些方面, 它们与全球高等教育更广泛的转变趋势相符, 特别是知识商品化。然而, 在伊朗的脉络下, 私人社会学课程同时也作为一种潜在的抵抗空间, 以对抗国家所施加的种种限制。

> 私人课程：从读书会到牟取暴利

在伊朗, 读书会与系列讲座长久以来便已存在; 然而, 付费的社会学课程要到了 2010 年代, 才开始在私部门的教育机构中出现, 例如 [Porsesh](#) 和 [Rokhdad-i Tazeh](#) (德黑兰两间知名的机构)。包含 [伊朗社会学会](#) 在内的学术协会也开始提供付费课程。这些平台提供的课程涵盖了广泛的领域, 从热门到小众的理论主题 (如《精神现象学》、德希达的《柏拉图的药局》), 到应用方法论 (如论述分析、NVivo 质性编码)。这些机构体现了一种「影子教育」的形式, 它们与正规机构并行运作, 但被截然不同的诱因与逻辑所形塑。

许多私人课程以单向讲授为主, 学生的参与度有限, 且缺乏课程大纲、评量机制或作业。少数私人机构会颁发证书, 主要供博士班申请者用来强化个人履历。落差极大的课程收费, 以及贩售课程录影所带来的微薄收入, 构成了这些机构的利润来源。尽管存在经济诱因, 私人社会学机构的获利普遍不高, 在本研究访问的八所机构中, 已有两间宣告破产。

毫不意外地, 这些机构会优先开设低成本、单向讲授式的热门主题课程。起初, 这些多半是流行的理论主题, 吸引了德黑兰等主要都会区的知识阶层, 创造稳定的客源; 这些城市不仅设有多所主要大学, 其学术圈长久以来也发展得相当蓬勃。然而, 这些课程也面临了批评的声音。其中一名受访者便指出, 私人机构的营利动机如何使他们更加侧

重于小众的西方理论: 「这些机构主导了议题设置, 他们是势力庞大的企业, 运作起来宛如商人。而商品是什么呢? (社会) 思想就是商品; 而这种思想与我们实际的社经处境根本严重脱节。」(受访者5)。

> 私人的底层反公共领域

这些空间发挥了 Fraser 所谓的底层反公共领域 (subaltern counterpublics) 的作用: 一种半自主的论坛, 让边缘化的声音能够在国家控制之外, 参与批判性论述。参与者来自多元的学术背景, 其动机包括学术探索、政治挫折感、建立人脉, 以及逃离大学体制的压力。许多人将这里视为知识上的避难所, 尤其在 2010 年代, 也就是 2009 年「绿色革命」(Green Movement) 遭到镇压之后, 该事件对大学校园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对于遭到政治边缘化的社会学家而言, 私人课程既提供了学术参与的管道, 也是维持生计的来源; 同时, 拥有稳定收入的大学教授也会来此授课, 因为他们将这些课程视为能够更自由表达批判观点的空间。

尽管需要取得政府许可, 但私人机构仍能提供比大学更为开放的讨论空间。相比于大学中僵化的层级体制, 学生更享受私人课程里轻松的权力关系。有些人将这些机构视为知识声望的来源, 特别是现已歇业的 Porsesh, 该机构在全盛时期握有相当可观的象征资本与菁英社会资本。私人课程也吸引了那些渴望跨出校园、向其他大学教授求教的学生。

参与私人课程的学生经常批评大学的社会学课程缺乏成效, 进而促使他们寻求替代方案。虽然私人课程提供了更高的参与度, 但各界对其教学品质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些人看重其提供的专业知识, 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课程只是将知识商品化, 授课内容几乎都是大众本就可轻易取得的公开资讯。他们认为思想商品化的风险在于, 将复杂的理论工作, 转化为供个人消费的市场行销内容。

许多私人课程为那些不满足于大学有限课程、渴望寻求深层理论探讨的学生提供了知识空间。然而, 批评者认为, 这些课程往往过度推崇西方思想, 却未能探讨其与伊朗在地脉络的关联性。其中一名受访者将这种体验比喻为一种精神上的宣洩, 参与者以为充实了知识, 但实际上却缺乏实质的学习。该名受访者也为官方的大学教育辩护, 表示大学教育能让学生接触到伊朗本土的社会研究, 而不像许多私人课程那样, 仅将焦点放在脱离现实的理论探讨上。

> 影响

在伊朗处处受限的学术环境下，私人课程提供了一个备受争议却至关重要的替代方案。有些人认为，这些课程借由提供高品质的替代方案，削弱了大学的根基，进而使学生不再参与学术体制内的倡议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国家严密控制的学术环境中，私人课程对于保护独立的社会学论述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主张，大学体制已过度僵化而难以改变，这使得体制外的知识生产空间成为必要。还有些人将私人课程视为一个崭新、但存在缺陷的批判性参与平台：「如果这些机构关闭了，我们还有什么替代方案？国家将会掌控一切。」（受访者23）。

私人课程也揭露了伊朗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更深层的结构张力，尤其是在改革与体制正当性的问题上。虽然有些人相信来自私部门的竞争压力能迫使大学做出改善，但也有人担心这些机构会成为转移焦点的工具，让国家得以规避改革的责任。对许多人而言，在伊朗处处受限的学术环境下，私人的社会学课程确实提供了一个备受争议却关键的替代方案。

私人课程的社经影响同样值得关注。数十年来市场导向的改革，重塑了伊朗高等教育的样貌，使入学管道变得日益阶层化。主要公立大学的入学竞争变得异常激烈，且申请机制极易遭到高收入家庭的操弄。此外，这些大学理应免收学费，却不断利用各种漏洞来向学生收取费用。公立大学教学品质的下滑与私人付费课程的兴起，强化了既有的不平等，并进一步限缩了取得高品质教育的管道。

在许多国家，微型证书的出现源于企业对大学端所施加的压力。而在伊朗，付费课程则起因于政治局势的动盪，以及由国家控制的学术体制本身的弱点。起初，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提供人们进行思想辩论的知识空间，但如今它们也纳入了技术导向的训练与认证制度，以提升学员的升学与就业前景。

> 结论

伊朗的私人社会学课程不仅体现了一种市场适应，它们更盘据在一个商品化与抵抗相互交锋的位置。作为一种影子教育，它们反映了新自由主义下的文凭主义逻辑，但同时也创造了挑战国家控制与思想趋同的反公共领域。这种针对系统性政治限制的私有化解方，反映了伊朗高等教育更广泛的变迁，亦即在经费短缺、意识形态干预以及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公立教育机构正不断遭到削弱。

未来的研究应该探讨社群媒体作为一种知识参与场域的兴起，将如何影响公共知识的动态关系，并重塑正式与非正式教育之间的边界。社群媒体平台固然可能拓展公共社会学的版图，将批判论述延伸至课堂之外，但同时也可能透过品牌经营与内容变现，使知识进一步被商品化。这种转变究竟是让社会学知识的触及管道变得更加民主化，还是仅仅以数位形式复制了市场逻辑？这仍是一个有待探究的开放性问题。■

来信寄至：

Reyhaneh Javadi <javadil@ualberta.ca>

Zohreh Bayatrizi <bayatriz@ualberta.ca>

> 伊朗的族群性：

当地社会学所回避的问题

Aghil Daghagheleh, 北科罗拉多大学, 美国。



伊朗族群多样性地图，显示主要族群。
图片来源：伊朗的族群，作者 Mapper 01
维基百科，CC BY-SA 4.0。

伊朗的族群议题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至少对主流社会学界而言是如此。伊朗境内拥有多个族群，包含波斯人、库德人、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俾路支人。波斯人在中部高原佔绝大多数，而其他族群则多集中于边陲地区。这种族群分界又正与宗教差异相互交织，什叶派在中心地区佔多数，而逊尼派人口则多集中于边陲地区。即使只是如此简短的描述，也足以引发诸多社会学提问，例如：这些族群与宗教的差异及交织，是如何形塑人们的社会经验？然而，令人讶异的是，在关于伊朗的学术研究中，这些分歧现象却遭到了忽视。

这并不是要否定日益增加的族群相关文献，这也是我稍后会谈到的部分。但在一般的社会学研究中，「族群」作为一个划分伊朗社会经验的分析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遭到否定的。探讨各种主题的研究不断出现，从伊朗革命、女性抗争、社会运动、底层政治，到该国所面临的其他社会政治挑战。然而，多数研究的主体始终停留在单一的「伊朗人民」，忽略了背后的族群差异。

这种否定，一方面源自于国族主义的视角，将伊朗描绘成一个自古以来便统一且同质的国家。因此，族群被视为仅是文化上的差异，而非构成社会经验的结构面向。这种观点经常透过颂扬[古伊朗文明和雅利安血统的神话](#)，来合理化国家的统一性，并否认国族内部存在差异。在这样的框架下，将族群纳入理解该国日常现实的分析主轴，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甚至危险的；因为人们担忧，承认族群的存在将会巩固这些差异，进而撕裂这个被想像出来的统一整体。

批判学者更倾向承认国族是一种现代建构产物。他们多数都认知到，在全球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中，伊朗并非特例。然而，在这种学术传统中，「族群」作为形塑伊朗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结构性面向，却鲜少受到关注，尽管近期有些研究已开始试图填补这块缺口。例如[Kadivar等人 \(2025\)](#)近期的一篇文章，便在分析伊朗近期抗争浪潮时，纳入族群的分析视角。然而，这种研究取径依然处于边缘位置。

这种分析上的失声绝非偶然，而是根植于伊朗社会学本身的位置性。在历史上，学术领域一直是由波斯人、什叶派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所形塑。这种传统倾向于将国族与伊朗中部高原的文化、语言及历史经验画上等号，从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实在存在的可能性。当我们考量族群与宗教的交织性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关键，因为庞大的边陲人口既是逊尼派，又非波斯人。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不同的边陲社群，在与中央政府的互动关系上，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轨迹。举例来说，现代伊朗国家的建立，在中心地区被广泛颂扬为现代伊朗国族的诞生与领土完整的象征；[但在边陲地区的记忆中，却代表了自治权的丧失](#)。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亦是如此，当时以什叶派为主的取向，在边陲地区引发了抵抗与随之而来的暴力镇压。当然，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但重点在于，[借用伊朗历史学家 Arash Khazeni 的话来说，这些来自边陲的观点](#)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依然处于严重缺席的状态。现下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观点难以调和，也不仅仅是研究者缺乏透过边陲人群视角看待社会世界的个人意愿。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一个深植于中心的学术立场而言，边陲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当然，潜藏在这一切问题底下的，是更深层的权力关系，不过在此我先不做讨论。

> 族群在伊朗通常都被形塑成病理学问题，而非不平等的分析面向

尽管族群议题大程度上存在这种分析上的失声，伊朗的族群研究仍发展成一个狭隘、孤立却日益成长的领域，国内许多关于族群的研究都采取了[政策导向的病理学视角](#)。族群被定调为一种「问题」，一个影响国家完整性，并且必须被加以监控、遏制或消除的对象。研究者们彷彿在评估风险般，穿梭于各个族群之间。他们不断评估各个社群的国族认同程度，衡量人们的族群归属与国族归属究竟是一致还是分歧，以及这在当下是否构成了威胁。

诸如分离主义、国家团结以及族群中心主义等主题主导了整个研究领域，有些研究甚至否认伊朗境内存在着「族群」，并将其描绘成是菁英或境外势力意图分裂国家所捏造的迷思。其他研究则将其视为一场正在发酵的危机，认为它是影响国家主权的潜在威胁或是未来冲突的引爆点，更是一个需要被诊断、治疗与管控的国安弱点及挑战。借用 James Scott 的话来说，这确实是一种「[以国家的视角来看](#)」(sees like a state) 的社会学。它试图让族群人口变得清晰可辨且易于管理，以达到控制的目的，而非以族群自身的主体性去理解他们。

同时，一批更具批判性与诠释性的研究在此浮现，分析族群政策是如何被更宏观的国家建构计画所形塑。这类研究并未以病理学的框架将族群视为待为

管理的问题，而是将族群认同置于国族建构、强制融合与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这类研究传统探讨了国家论述与体制如何透过语言同质化、压制少数族群历史，以及将非波斯社群安全化 (securitization) 等机制，来制造边缘化。部分学者也点出了日常抵抗的形式：少数族群如何协商、颠覆或挑战关于国族认同的主流论述。此外，探讨教育、医疗与经济机会中[族群落差](#)的[实证研究](#)也正日益增加，尽管综观来说数量仍属有限。这引发了一个深具挑战且至今多半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当代伊朗](#)，族群是否应该作为一个检视[不平等的面向](#)。

> 族群与长期抗争的紧密纠葛

然而，重要的研究缺口依然存在。首先是概念层面的缺口：在伊朗的脉络下，族群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这使得部分学者选择以「少数群体」等词汇来替代，以回避政治与理论上的张力。「少数群体」多指涉数量上的稀缺或结构上的从属位置，但较少触及那些具争议性的问题，例如：如何定义一个族群、如何划定其界线，或是如何避免本质主义式的认同论述。这种词汇的置换，让学者们得以追求 Rogers Brubaker 所谓的「没有群体主义的族群性」，如同 [Elling 的著作](#)所示。这使得学者在分析边缘化现象时，得以避免诉诸集体认同的主张，或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

然而，有个问题依然存在：在伊朗的脉络下，族群，又或是以「少数群体」这个更谨慎的框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未经充分批判便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西方理论往往强调认同、文化差异或象征界线，却鲜少关注主权的历史问题。在伊朗，族群不仅仅关乎文化的独特性，它与长期以来针对国家主权、领土控制，以及对边陲地区的强制兼并等抗争紧紧交织在一起。伊朗的主要族群，包含突厥裔、库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与土库曼人，大多集中在被称为边陲的地区，并在地理上远离德黑兰与中部高原。这些地区及其社群往往拥有半自治的历史，并与中央政府长期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将这些地区纳入伊朗国家政治实体的过程，伴随着军事行动、强制同化以及人口控制。然而，在当代关于族群的分析中，这些历史却经常被排除在外，导致我们难以全面掌握今日族群动态的复杂性。

> 将部落历史纳入族群社会学，揭示历史遗绪如何形塑当代现实

诚然，国家力量向边陲地带扩张的过程已有[文献](#)记载，尤其是在受底层研究影响的文献中。这些著作梳理了国家暴力与地方的抵抗行动，并多将其框架为「部落政治」。然而，关于部落政治与族群的研究却始终各自孤立：前者被归入历史范畴，后者则被视为当代议题；这种割裂将掩盖我们去理解历史遗绪是如何形塑当代现实的。若能填补这道鸿沟，将能为[伊朗的族群研究](#)开创全新的理论视野。

>>

目前已有少数且日益增长的研究，正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些研究借鑑了边陲地区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历史，进而对伊朗国家机器的本质提出质疑。他们检视了迫迁、文化抹除与国家暴力的种种历史事件，主张国家的形成不仅仅关乎现代化，更包含了殖民宰制的逻辑。从这个视角来看，伊朗向其具备独特族群色彩的边陲地区进行扩张，宛如一场殖民计画，而对此的抵抗便构成了解殖的实践。这种重新框架的视角动摇了主流典范，并要求将部落历史纳入族群社会学的探讨之中。

＞ 遭到噤声的实证研究需求：
正视生命经验的多重性

尽管如此，无论采用何种理论框架，理解族群都需要具备实证基础。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种活生生的、不断协商且具备情境性的现象来研究，而这种现象正是由日常实作与充满角力的意义所形塑。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投入长期的民族志参与。然而，在伊朗，这类研究却受到政治与结构性障碍的严重打压。族群的安全化措施形塑了一种恐惧与自我审查的氛围。研究者与报导人同样都面临着被指控为宣扬分离主义或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这使得田野工作变得如履薄冰，学术机构也不太可能去支持那些挑战主流论述的研究。

将族群置于伊朗社会学的核心关怀可以迫使学界必须直面自身的排他性、挑战主流的国族想像，并承认生命经验的多重性。这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伊朗国家机器产生更贴近现实的理解——这个国家不仅是由革命与意识形态所形塑，更是由充满角力的地理空间、边陲历史，以及对主权的抗争所共同建立的。■

来信寄至：

Aghil Daghighaleh <aghiil.daghighaleh@unco.edu>

> 处境中的生命与知识之 重夺伊朗性别研究

Shiva Alinaqian, 独立研究者, 伊朗。



插画来自: Yonesu

在我于德黑兰 (Tehran) 的大学教授性别、民族志与叙事课程的八年里, 我的个人经验一直被制度方面的限制与日常政治所纠缠。我的教学职位在2022年——即「女性、生命、自由」起义 (吉纳起义¹) 展开的时刻——被免职, 不仅标志着个人的断裂, 更暴露了伊朗关于性别的批判性知识的生产如何与权力关系还有日常抵抗形式密不可分。在这些条件下, 即使是很小的教学决定——邀请学生撰写迷你民族志、强调生活体验、或将全球女性主义理论与在地叙事并置讨论——也会变得非常政治化: 它们破坏了制度的预期, 即性别仍然仅限于法律 - 行政 (legal-administrative) 或「安全的」家庭政策框架。

因此, 课堂不再是受保护的学术空间; 它是一个处所, 在其中, 国家的规训逻辑与学生理解自身生命的欲求发生冲突。对我的解聘, 不过是更加显明了许多教员早已知道的事情: 在伊朗这个地方, 性别知识是危脆的 (precarious), 因为它源于日常生活, 而非不顾生活。

> 伊朗性别研究年表: 一个由上而下建立的学科

为了理解在伊朗性别研究中运作的教学实践的利害关系, 必须将它们置于该领域的当地历史脉络中。伊朗的性别研究并非生长于一个开放而自主的学术环境, 而是在一个社会科学已受到严重限制和政治监控的脉络下发展开来的。文化革命 (译按: 指的是伊朗的文化革命而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1980年至1983年间对各大学机构的重组行动——的阴影仍形塑着今日伊朗的学术生活: 各个人文学科相关的部门都受到审查、课程被重写, 而被认为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学科则受到严格监管。性别研究即是在这样的怀疑气氛中诞生的。

二十一世纪初, 性别研究的领域作为国家项目正式启动。女性研究的计画被引入到各个主要的大学之中。但其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在于培养女性主义批评, 而是要对一个在社会上越来越显眼的知识领域进行管控 (regulate)。随着女性行动主义的扩大以及性别辩论进入公共生活, 国家透过界定研究「女性问题」的术语来遏制这些能量。该学科成为了将社会关注转化为法律 - 行政以及家庭中心之类的框架的机制, 而不是允许它们发展为批判性的调查。

伊斯兰教神学院使得这种紧张关系更加明显。女性主义理论进入这些神学空间, 但仅限于伊斯兰法学 (Islamic jurisprudence) 的范围内。它们被调动来重申「自然角色」、捍卫教义边界或提出宗教异议, 而不是为了重新思考性别等级制度。在各大学和神学院中都流传着女性主义的各种概念, 但只有在其变革潜力受到有效中和的条件下。

这些制度性选择被管理社会科学的更广阔的认识秩序给加强了。实证主义和古典的量化方法主导着制度上的等级制度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形塑了被视为合法知识的东西, 并将基于生活体验或体现 (embodiment) 的方法视为「不科学」。这种等级制度符合国家对去政治化 (depoliticized) 及有行政有利 (administratively useful) 的学科的慾望。

> 草根知识和来自下层的抵抗
在致命缺陷中开闢了机会

一个根本性的缺失进一步形塑了该学科：近乎遭到完全排斥的酷儿理论，在法律和学术上都深受边缘化。这一缺漏禁止了性别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可能将性别与性倾向、欲望、亲属关系及非规范体现联系起来的交叉分析。相应地，英语自由女性主义 (Anglophone liberal feminism) 的主导地位——在没有产生它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引进——将该领域缩小到个体化的和中产阶级式的关怀。虽然不足以提出影响少数族裔和属下阶层 (subaltern) 女性生活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框架在中产阶级背景下带出了尚未解决的挑战：生殖和护理工作的持续贬值、法律上的可受伤性，以及贫穷的女性化。这些力量共同造成了一种名义上存在但实质上受限的学科：它如今必须同时面对其长期忽视的受众群体，以及其所自以为核心之内部仍然持续存在的平等。

即使学术领域仍然狭窄，它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虽然女性研究从未完全在大学内巩固，但始自二十一世纪初，它与女性行动主义深深地交织在一起。透过非政府组织、慈善协会、文学界、运动和日常实践的无声抵抗，女性产生了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的形式。这些草根的知识形式在与自上而下建构的学术结构的张力中存在着。

这段历史过程产生了一种由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所形塑的学科：自上而下的管控与自下而上的抵抗。这二元动态——国家控制与女性主义创新——界定了伊朗性别研究的轨迹，并继续为重新思考社会知识的界线开闢了机会。

> 从管控到夺回：伊朗性别研究的改造

在长久以来构造了伊朗性别研究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下，女性主义学者、学生以及运动人士稳固地——经常是默默并冒着个人风险地——付出努力，以便重夺他们被从中排挤在外的智识空间。在我的课堂内，这样的抵抗可见于学生们选择撰写的报告：关于照护劳动、亲密关系、流动性，以及那些形塑性别化生活的细节规范之叙述。这些可不仅仅是习作，而是一种叛逆 (insurgent) 的知识型态，反向抵抗着该领域被驯化的趋势。

在大学体制之外，女权运动人士、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者、库尔德 (Kurdish)、阿拉伯及卑路支 (Baluchi) 的女性主义者、女性移民，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建立起以活生生的挣扎经验而非国家认可之课纲为基础的分析框架。这项长期累积的工作，为之后的吉纳起义所引发的深刻转向奠定了基础。

吉纳时刻源自伊朗库尔德斯坦 (Kurdistan)，使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意识可被辨识：其取向乃交叉性的、去殖民的及跨国性的。它汲取自库尔德、卑路支、阿拉伯与移民女性数十年的组织经验。这些女性长期面对父权、军国主义、种族边缘化和经济剥夺等相互交缠的统治机制。她们的斗争使以德黑兰为中心的女性主义被地方化 (provincialized)，揭示出性别与族群、阶级、暴力以及殖民性是如何不可分离的。

这一新近出现的女性主义意识乃根植于在地，却同时关注暴力与团结在全球脉络中的流通。它承认罗杰拉特 (Rojhelat) 及希斯坦-卑路支斯坦 (Sistan-Baluchestan) 的抗争，与巴勒斯坦及阿富汗的抗争彼此共鸣，而其对生命和尊严的要求始终是跨国的。它挑战性别研究脱离其由国家形塑的起源并以自下而上的团结为轴心，并围绕着从身体、社群与日常生活之生存之中浮现的知识来重建自身。

> 落实一种基于生活体验的
社会学以及委身于集体转化之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解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更广大斗争——关于谁有资格生产知识，以及哪些知识形式被允许存在——的一个征候。它提醒我们，要重夺性别研究，就要把那些长期被视为边缘的叙事、照护以及紮根式探究推到舞台的中央。

由此出发，女性主义实践 (feminist praxis) 所呈现出的并非性别研究的替代方案，而是其重新导向。它推进一种区域性的团结伦理，将少数族群、阿富汗及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并置，却不致制造苦难的阶序 (hierarchies of suffering)。在这景观中，性别研究作为一种连结性的实践而浮现，倾听、翻译并使边缘化的生活世界变得可见：一种既处境化又具横跨性 (transversal) 的认识论；既紮根于脉络，又能跨越学科、国族与身分的疆界。其未来不取决于制度性的承认，而是取决于能否生产并落实一种以人民为本、基于生活体验并委身于集体转化的社会学。■

来信寄至：

Shiva Alinaqian <sh_alinaghian@yahoo.com>

1译注：吉纳起义 (Jina uprising)，指的是 2022 年伊朗库尔德族女子 Masha Amini 或称 Jina 在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后，引爆并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抗议浪潮。

重重限制下的伊朗社会学研 圆桌论坛



图片来源: Hans-Peter Gauster, 经Unsplash报导。

本次的圆桌论坛汇聚了六位致力于伊朗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分别立足于不同的学术领域与制度环境，并横跨多个地缘政治区域。尽管他们在社会学学科训练上志同道合，但他们各自在伊朗境内与境外所处的位置，塑造出迥异的立场，从而跨越国界、语言与制度藩篱，共同建构知识体系。本圆桌会议围绕三个核心方法论问题，探讨伊朗社会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创新与伦理困境。尽管研究主题涵盖都市生活、教育政策、数位行动主义及环境正义等多元领域，所有参与者皆秉持紮根实证、批判与反思性参与的学术态度。每位学者皆在政治限制、知识消弭、制度束缚及全球知识生产阶层结构的复杂环境中，探索伊朗社会研究的疆域。参与者简述如下：

>>

Nafiseh Azad 是驻伊朗的社会研究者，其研究聚焦于运用质性方法探讨性别与都市生活。Maral Latifi作为研究都市边缘性与社会受苦的伊朗学者，深入剖析德黑兰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现象。Mahbubeh Moqadam现为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候选人，运用跨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青年行动主义、美学与政治主体性。Fatemeh Moghadasi 是伊朗教育与社会政策学者，研究教育私有化、童工现象及反贫穷策略。Ladan Rahbari，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探究（数位）论述与性别及抵抗的政治。Reza Sohrabi，渥太华卡尔顿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环境政治与水资源短缺问题。

这些学者共同探讨三大核心议题：如何在监控与受限的环境下突破研究伊朗的方法论限制；在政治敏感性与风险并存的背景下，哪些伦理框架能引导其研究方向；以及全球权力动力如何塑造知识生产的条件与层级结构。这些问题由 Reyhaneh Javadi 与 Nazanin Shahrokni 提出，她们不仅为对话设置框架，更引领了整个讨论进程。

Reyhaneh Javadi (RJ)与Nazanin Shahrokni (NS): 让我们从那些形塑了「研究之可能性」本身的各项挑战开始谈起。在进行关于伊朗的研究时，您曾遭遇过哪一项具体的方法论障碍？您又是如何应对或调整研究策略？这段经验对于在政治限缩或资讯不透明的语境下从事社会学实践，提供了什么样的更广泛的启示？」

Nafiseh Azad: 我近期的研究聚焦于女性与都市生活的交织，并透过质性研究方法探索女性的生活经验。在研究过程中，有两大阻碍持续贯穿着这项研究，并决定了这项工作开展的途径，包含数据获取受限，与围绕着伊朗女性议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

获取可靠数据仍是社会研究的重大挑战，尤其在性别相关领域。关键统计数据——如自焚或荣誉谋杀案件——往往被列为机密或无法取得。透过交叉比对伊朗统计中心数据与半官方机构及民间组织发布的数字，我得以在重重限制下，萃取出部分洞见。

第二道障碍源于伊朗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这不仅侵蚀了独立国家级研究的可能性，更摧毁了相关研究基础设施。愿意触及敏感议题的独立研究机构寥寥可数，但它们在大学体系之外提供了关键契机。我近期关

于女性经济能动性的研究，便是透过此类机构完成。

政治敏感性依然位研究课题设下诸多限制：某些议题仍属禁区。尽管如此，透过聚焦于可接触的群体与领域，并在方法论上寻求创新，我得以产出具广泛社会学意义的深度质性数据。虽然研究成果的公开传播仍受限制——尤其在学术期刊以外的平台——但着肘策略让我得以持续维持批判性的研究动能。

Nafiseh对于获取女性议题可靠数据之难处的反思，与我研究社会政策制定时的亲身经历不谋而合。在我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障碍并非源于文化禁忌，而是源于深植于该领域本身的制度性限制。

社会政策制定需仰赖研究者与决策者间的持续互动，但在伊朗，这种关系显然是很薄弱的。学界由抽象且偏重哲学的研究路径主导，加上政策制定者对实证研究的需求微乎其微，这不仅孤立了研究者，更切断了知识生产与政策行动之间的联系。这种断裂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教育不平等及公立教育私有化的研究，使我在过程中反复遭遇方法论的障碍。

首先是微观层面的数据搜集的问题。要有效分析教育不平等现象，必须取得能反映学生个人背景、家庭状况与环境脉络的数据。在伊朗，此类数据不仅稀缺、报告不一致，且通常仅能取得国家或地方层面的资料。透过教育部等机构取得详细数据的正式管道，大多缺失或形同虚设。这迫使研究者仰赖非正式管道与个人网路——此类方法不仅难以持续，更充满伦理争议。

其次，政府对调查数据的管控构成重大的阻碍。自1990年代以来，伊朗虽进行了大量由公共机构资助的全国性及地方性意向调查，但独立研究者始终无法取得相关数据。这种对实地数据的垄断，加剧了伊朗社会科学领域可靠资料来源的整体匮乏。

最后，研究场域的进入门槛日益严苛。即便持有部会核发的官方许可，进行校园观察、访谈或其他形式的数据蒐集时，仍常遭遇官僚障碍或猜疑。教育环境被视为政治敏感空间，连基础实证研究都难以开展。研究者往往被迫依赖文件或二次分析，导致质性研究的范围与深度受限。



伊朗国家图书馆。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些限制不仅形塑了可探讨的议题范畴，更直接影响在伊朗进行具实证基础之政策研究的可能性。

Ladan Rahbari: 如同 Fatemeh 所说的，我也一直苦于数据获取困难或资讯不全的问题，但她所提到的那种制度性隔阂，对于离乡背井且无法安全或轻易进入田野的研究者来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在伊朗境外进行研究，无疑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关于这点，我可以从我对于反抗与异议的数位论述的研究中举例。

在我当前的研究项目中，我正分析 2022 年「女性、生命、自由」运动期间及之后流传的波斯语推文。作为一名在专业与个人层面皆与主题密切相关、却远居事件中心地带之外（荷兰）的研究者，我耗费了相当时间才对这场运动建立社会学层面的理解，并准备好展开研究。

我的研究聚焦于波斯语使用者如何表达对宗教

的态度。我始终面临着一项方法论的挑战：如何将「作为宗教信仰的伊斯兰」，与「作为政治体制的伊斯兰共和国」两者之间的批判，精准地厘清与区隔开来。这项分析难题对许多研究伊朗及宗教政治论述的学者而言并不陌生。我观察到研究者往往倾向过度诠释数据，使其偏向两极立场之一。

若能直接进入田野，我将辅以大规模质性—量性调查来深化意图与诠释的厘清。我深知远距调查在技术上可行，但透过他国线上工具实施将衍生诸多复杂性与偏误。此外，正如伊朗研究学者所知，离散社群无法作为伊朗整体人口的可靠替代样本。因此，我只能运用这些不完美的工具进行研究。

当然这些挑战还是有能够克服的方法。举例来说，我必须采用替代方案，诸如邀请协同阅读人、进行协作诠释，以及实施成员查核（Member-checking）技术。即便如此，我仍然深信这些策略虽然具有价值，却无法完全取代在伊朗境内进行严谨且具代表性调查所能达到的深

>>

度与广度。针对特定对象的远端成员查核法或许能稍解燃眉之急，却无法彻底消除诠释上的歧异。这仅是我近期研究中众多方法论限制与挑战中，必须正视并设法突破的一个近例。

Mahbubeh Moqadam: 我深切认同 Ladan 对田野距离感与旅行限制的忧虑，这迫使我重新定义「身处田野」的意涵。在研究 Z 世代于「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的角色时，我面临最严峻的方法论挑战，在于无法亲赴伊朗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此限制阻断了民族志研究至关重要的日常互动与非正式对话管道。

该运动催化了伊朗各地青年主导的抗议行动，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与威权统治。我并未放弃这个主题，而是转向数位民族志研究。我持续钻研此方法，并开始系统性地从社群媒体、新闻报导及数位档案库收集资料。为深化此数位研究法，我透过滚雪球抽样法建立信任网路——不仅与现居伊朗者进行线上访谈与非正式对话，亦接触近期离境人士。同时定期与往返伊朗与美国的旅人交流，针对性提问并汇整其观察。伊朗友人则协助我取得最新研究文献与学术论文。

尽管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此种适应性多源策略已使我得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与观点，即便身处异地，仍能对该领域形成更扎实且细腻的理解。

Reza Sohrabi: Mahbubeh 转向数位民族志与轶事叙述的实践，令我深刻体悟当今研究的可及性不仅取决于与参与者的关系，更系于研究方法本身。就我而言，信任建立不仅是研究的先决条件，更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

我的博士研究聚焦伊朗水资源短缺与社会运动，透过伊斯法罕省与库兹斯坦省的比较研究，访谈学者、运动人士及农民探讨水资源政治。田野调查的限制尤为明显，尤其在招募参与者方面。

与 Mahbubeh 相似，海外研究使建立信任成为取得访谈的关键。为此我大量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在不透露是否会追踪的状态下征求推荐名单，以保障匿名性。我同时发现社区参与是极有效的策略——在访谈前与参与者建立开放沟通，有助传达研究的学术性质与目的。当他们理解自身贡献的意义后，许多人便积极参与其中。

在政治敏感的环境中，研究需要立足于在地化的方法：这些方法仰赖参与者对研究者的信任，以及他们对研究价值的认同。对我而言，沟通与社区参与不仅是取得研究管道的工具，更是受限条件下以符合伦理且有效方式进行研究的核心要素。

Maral Latifi: Reza 所强调的敏感研究环境中信任的脆弱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的博士论文透过 Bourdieu 的理论框架，探讨德黑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下滑现象，聚焦于伊朗近期经济危机下社会受苦与空间迁移的相互缠绕。实证研究采集了 32 位经历此轨迹者的访谈资料，其中 25 份构成分析核心。两项核心方法论挑战促使我们采用反思性、关系性的 Bourdieu 理论取径。首先，受访者需阐述多年累积形成的慢性沉淀式社会受苦——即 Bourdieu 所称的「世界的苦难」。其次，这些经历与贫困化进程紧密相连，而对中产阶级而言，贫困化过程伴随着特殊污名。

这种双重困境可能使访谈沦为公式化的对话，更关键的是，可能在研究互动本身中重现结构性暴力。要以符合伦理的方式处理这些关于丧失与流离失所的叙事，必须采用谨慎且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方法论。

RJ 与 NS: 从您的反思中可知，方法论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由研究展开的条件所形塑：当研究管道极其脆弱、资讯遭到隐匿、研究场域本身持续动盪时，您在进行关于伊朗的研究时，是如何处理与风险相关的伦理张力——无论是对您个人、您的对话者，或是数据本身的安全？有哪些伦理原则指导着您的决策？这些原则又在哪些方面复杂化、甚至挑战了现有的主流研究伦理框架？

Ladan Rahbari: 与许多研究伊朗的社会学家相同，我不断面临受访者、自身及合作研究人员的安全与保密问题。然而，我近期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既非来自研究现场本身，也非源于伊朗政府，而是来自于我的大学的伦理审查程序。

在我为先前提到的计画申请并取得经费后，本校伦理委员会却将其标记为「高风险」计画。他们的假设是：任何与伊朗民众的接触都可能触发伊朗政府（远距）监控机制，进而针对我本人、所属机构，以及我所研究的社群媒体用户进行干扰。我承认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

我也确实抱持着相同的顾虑；然而，校方为降低安全风险而提出的防护措施，却显得缺乏充分依据，更将使研究变得极其困难，甚至近乎不可能执行。

其中一项建议是要求我取得该大型数据集中所有社群媒体用户的知情同意。此举不仅难以实现，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与我直接接触反而可能让这些用户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另一项建议则是要求我在极度加密且封闭的数位环境中进行所有分析，并立即删除数据；这将导致我无法重新检视素材，也无法验证我的研究发现。

历经数月协商，我终于获准得以推进计画。这个漫长过程导致计画延宕了数月才启动。经历这番折腾后，我深感沮丧而决定不再收集新数据，转而采用荷兰另一所大学同事编纂的现成资料集——该同事早已取得其校方伦理审查许可。如此现成资料集的存在实属万幸。

分享这段经历，是为了揭示（西方）机构伦理框架本身如何沦为安全化的工具，尤其当研究聚焦于被视为「敏感」与「高风险」区域的所谓非西方语境时。这类程序纵使初衷良好，却可能因此引发自我审查，或使学者们却步，从而彻底改变研究主题或策略，进而限制学术自由——尤其对像我这样的移民学者与离散学者而言。

Mahbubeh Moqadam: Ladan 所描述的那种体制性安全化的现象，也反映了我在研究工作中常面临的伦理困境。在我针对伊朗 Z 世代数位行动主义的研究中，伦理张力往往围绕着能见性与风险这两者展开。

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涉及一名少女——她的 Instagram 公开内容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成为了具代表性的象征。尽管她的贴文广为流传，我仍选择不直接引用原文。取而代之的是，我将其内容进行匿名化与改写，并融入复合叙事（composite narrative）之中，以避免其身份被重新识别。我始终将参与者安全与意愿，置于数据的「完整性」之上。尽管某些伦理框架将公开数据视为中性素材，但在如此政治敏感的环境中，我绝不能忽视过度曝光所带来的纪大风险。

在运动遭到镇压后，那个女孩删除了大量贴文与限时动态。她的个人帐号的调性出现了明显

转变：Instagram 的精选动态与 Telegram 贴文从原本充斥着锐利的社会政治评论，如今转向幽默趣闻与琐碎日常。这种转变深刻地体现了曝光后所面临的真实风险。

在与伊朗境内受访者进行线上访谈时，更多的伦理考量随之浮现。我使用 Signal 等加密通讯平台，除非明确征得对方同意，否则绝不录音，并确保受访者完全匿名。这些做法不仅是技术上的选择，更是一种深层的伦理承诺；这样的承诺源自于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身处于危险与动盪的环境中所建立出来的。

Reza Sohrabi: Mahbubeh 对能见度的关注，正是我们许多人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在不让参与者身陷危险的前提下，完整呈现他们的叙事？在我的研究中，我透过一套「以受访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来应对这项伦理挑战，让受访者能随访谈过程的推进，随时评估并形塑访谈的进行方式。

事实证明，进行匿名访谈至关重要。这使得参与者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意见，而不必担心遭遇后果。匿名性明显地减轻了许多人在阐述观点时感受到的焦虑。在一个案例中，有位运动人士详细批评了政府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尽管对话过程气氛开放，该参与者事后仍担心其言论是否可能被追踪。在深入讨论相关风险后，对方确认其意见内容无法被识别，才同意将该内容纳入研究中。

尽管如此，我仍采取了进一步措施来强化匿名性，包括删除具体时间与地理位置的描述，以将曝光风险降到最低。此举既保留其叙事的核心内容，也保障了受访者的隐私安全。

这次经验让我深刻体悟到，进行伦理研究——尤其是在政治敏感的环境中——不仅需对能见度的伦理保持敏锐，更必须将保障参与者安全视为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参与者的忧虑所保持的弹性与即时回应，是孕育信任空间的关键，而这最终也才使得这项研究成为可能。

Maral Latifi: 如同 Reza，我逐渐体会到，伦理不该只是一份清单，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互动关系。对我而言，这不仅需要重新思考匿名制，更需要重新审视与参与者互动的基础逻辑。为了在伦理层面抵抗将参与者客体化的倾向，互动的视角必须从外在化的「你」转向集体且具备共情能力的「我们」。

然而，正是这些促进信任与接触的条件，也让匿名化工作变得更为复杂，进而要求研究方法上的调适。例如，我选择放弃描绘传记式肖像——尽管它或许能更深刻地捕捉参与者受苦的关系深度——转而采用主题分析法。虽然这牺牲了叙事的连贯性，却能为受访者的身份提供更周全的保护。

Fatemeh Moghadasi: Maral 提到的关于邻近性与风险的观点，点出了我经常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支撑伦理研究的那些信任与亲密感，往往会与国家机构产生冲突，因为后者将任何批判性探究视为政治威胁。尽管学术界赋予研究者选择研究主题与方法的自由，但只要研究跨越了学术边界——无论是透过与国家机构合作，还是研究成果的公开传播——这种自由便迅速萎缩。这些限制不仅是技术或官僚层面的问题；它们在本质上具有更深层的伦理与意识形态意涵。

在教育政策制定领域，当批判是针对管理效率低落或行政层面的缺实时，通常能获得包容。然而，一旦批判转向更深层的问题——例如教育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学校中植入的规范性价值，或是涉及语言、文化与政治正义的诘问——所引发的回应往往不再基于学术对话，而是源于意识形态的警觉或政治控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结构性批判鲜少受到欢迎，反而经常被斥为「政治操弄」，或是被指控在「削弱国家体制」。这些条件使研究者陷入艰难的伦理处境，必须在科学诚实、田野准入，以及个人或专业安全之间不断进行协商——特别是在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研究领域，更涉及其独有的风险与复杂性。

Nafiseh Azad: Fatemeh 所提到的研究自由政治化的困境，正是女性研究的日常——在那里，对安全与知情同意的考量形塑了研究的每一个阶段。由于我采用的是民族志方法与立意抽样，匿名制变得至关重要，在针对女性的研究中更是如此。我采用多种技术来保障参与者的安全，包括匿名化数据储存、删除可识别细节，以及在研究结束后销毁访谈纪录。受访者可以随时撤回全部或部分的访谈内容，也可以随时要求我停止录音。我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例如避免透过通讯软体或电子邮件传送访谈内容，且唯有在参与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我才会将资料分享给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

在某些情况下，若受访者不同意分享原始访谈内容，我会拒绝将研究提交给委托机构。在其他情况下，我则承担起书面分析的全部责任，以避免洩漏参与女性的姓名或所在地。在缺乏制度保障与资源的非大学体系中，这些预防措施执行起来便更具挑战性。

或许这份工作最痛苦且无可避免的一点在于，当我觉得无法保障数据、参与者或我自身在发布成果时的安全时，我会预防性地放弃整个研究领域。

RJ & NS: 这些伦理与方法论上的张力并非仅是地方性的，它们更深植于全球权力结构之中，并受到知识政治的形塑。从「哪些问题可以被提出」到「谁的叙事被视为可信」，权力始终决定着什么能够称作「研究」。全球动态——诸如国际制裁、离散者的位置性 (*diaspora positionality*)，或是西方学术界的期待——究竟如何形塑了伊朗社会学知识的生产、流通与接收？

Maral Latifi: 另一种在伊朗较不显见、却阻碍着社会学知识产出的因素，是对于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回应即时政治发展、或预测集体抗争最终结果的普遍诉求。这种根植于「转型中社会」话语的命令，微妙地抑制了对社会空间动态进行基础研究的积极性。讽刺的是，正是这类压力，限制了一套具备细腻阐释当下的能力、并能想像未来社会可能性的伊朗社会学的诞生。

Fatemeh Moghadasi: 延续 Maral 的观点，我发现即便致力于推进长期或基础研究，也往往会受阻于结构性的经费限制。伊朗社会学研究的一大障碍，是大学与研究中心过度依赖委托计划案，而这些计划经费通常来自于政府或半政府机构。此类计划遵循「需求与回应」模式，几乎没有空间留给独立或长期探究。

根据我的经验，我曾针对迫切的社会议题草拟过研究计划，却因缺乏资金而最终未能实践。这不仅浪费了研究潜能，也削弱了研究动力，更降低了知识产出的品质。

在国际层面，伊朗鲜少在社会政策制定领域被列为优先研究案例。聚焦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机构，其研究议程往往倾向于符合国际组织的利益，或偏好选择数据更易取得的案例。结果，伊朗议题经常被边缘化，或被简化为地缘政治与安全框架下的产物。

此现象在教育私有化的文献中尤为明显。即便阿富汗与伊拉克处于危机之中，却仍频繁出现在分析中；反观伊朗，尽管经历重大的政策转变，却在学术讨论中大程度地缺席。这部分原因于缺乏透明的数据系统，以及长期缺乏国际合作，使得伊朗难以在跨国研究框架中被定位为一个「可被分析的主体」。

Reza Sohrabi: 延续 Fatemeh 关于结构性排斥的论点，我想进一步强调国际制裁如何重塑了学术研究最基础的后勤运作，这对离散学者而言尤为显著。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从多方面冲击了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我无法为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援或致赠礼物，因为包括礼物卡在内的国际交易皆被封锁。

我也曾申请过外部研究资助，但申请书根本未进入审核程序，仅因为我的田野地在伊朗。其理由是禁止在「战区」进行研究——尽管近年来伊朗并无实质冲突，却仍被归入此类。这反映出西方对中东与全球南方地区的军事化想像如何形塑其分类体系，误导了当地现实，并将离散学者排除于核心资源之外。

这类经历揭示了离散学者所面临的独特困境：行动受限、资金匮乏，以及在非政治化脉络下工作的学者所不会遭遇到的结构性学术障碍。

Nafiseh Azad: Reza 所提到的孤立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深层的智识隔绝。身处伊朗境内，我深切感受到由国际制裁与国内限制共同形塑的窒息式孤立。制裁限制了获取学术资源、培训计画及关键研究工具的管道；参与国际会议常因签证被拒而受阻，近年来更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些障碍诱因伊朗政府对参与国际活动的限制而进一步加剧，导致伊朗学者陷入全面性的孤立——这种孤立并非正在成形，而是早已根深蒂固。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西方学术机构的预设期待与偏见，它们往往遮蔽了伊朗社会——特别是关于女性——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对于中东穆斯林女性的刻板印象持续左右着期刊审稿人与编辑的感知。我近期一篇论文被某知名性别研究期刊退稿，理由是研究发现被认为「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我发现这源于我的研究与西方关于穆斯林女性的主流叙事之间存在着「失调」。文中对于主体性、反抗，或是对家庭与母职的替代性诠释，经常在根本层次上遭到质疑。

在整个审稿过程中，我愈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并未被视为一名研究者，而紧紧被当作一名数据收集员。在另一篇历经大幅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文章中，我有一种鲜明的感受：那些从未踏足伊朗的审稿人，竟自认比我更了解伊朗女性。试图呈现女性的多样性与蜕变而努力，往往在全球学术场域中遭遇强大的阻力。这种动态在学术会议中更为显著。遗憾的是，某些身处西方机构的伊朗学者甚至强化了这种风气，以同样「异域化」的视角来评断同侪的研究。然而，透过深入田野所呈现出的女性，其生命轨迹与选择，无不挑战着这些片面而简化的叙事。

Ladan Rahbari: 我想将焦点转移至离散空间——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内部——关于发声权与可信度的政治学。身为庞大伊朗离散社群中的一员，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体制资源赋权的学者，我一方面既能免于伊朗国家的直接压迫，并享有并非人人皆能获得的支援。尽管我仍面临远端监控与骚扰的威胁，却同时遭遇其他形式的守门 (gatekeeping)，这不仅存在于学术机构内部，令人遗憾地，也存在于离散伊朗人的社群中。

我也观察到，某些类型的声音——尤其是那些被视为亲西方的世俗派（有时是自封的）专家——更容易在西方语境中获得青睐。这些人往往倾向复制关于西方救世主情结的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叙事。在这样的环境中，当某些（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离散叙事已然形塑了西方所接受或偏好的框架时，其他声音变很难被听见。

这使得产出紮根于实证的学术研究变得更为重要。然而，正如我先前所言，过度安全化的研究规范不仅对数据收集与处理造成了严重障碍，更阻碍了更广泛的知识生产过程。我亦认同 Nafiseh 所说的：学术机构往往固守既定的认识论典范，在面对替代性的知识或知识生产形式时缺乏弹性。我认为我们需要摒弃将我们视为数据矿场、用以验证既定西方理论的做法：伊朗的语境具有其独特性，唯有结合在地、区域乃至跨国层面的知识谱系，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质。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抵抗简化、进口、重复且往往陈腐框架的、严谨而细腻的研究。

说了这么多，我也深知这绝非易事。制度与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压力，不断逼迫我们简化伊朗

>>

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我们不能将一切都归咎于结构；学者与其他人一样，都是受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市场一份子，有时做出艰难的「选择」代价高昂。在这些挑战中穿梭，同时还要应对方法论与伦理限制、学科规范、离散政治及持续存在的守门机制，真是让人精疲力竭。对于许多试图在残酷就业市场中生存的（尤其是生涯早期的）学者而言，这类认识论的决策早已与个人生活纠缠在一起。就像我们社会学家常说的：情况很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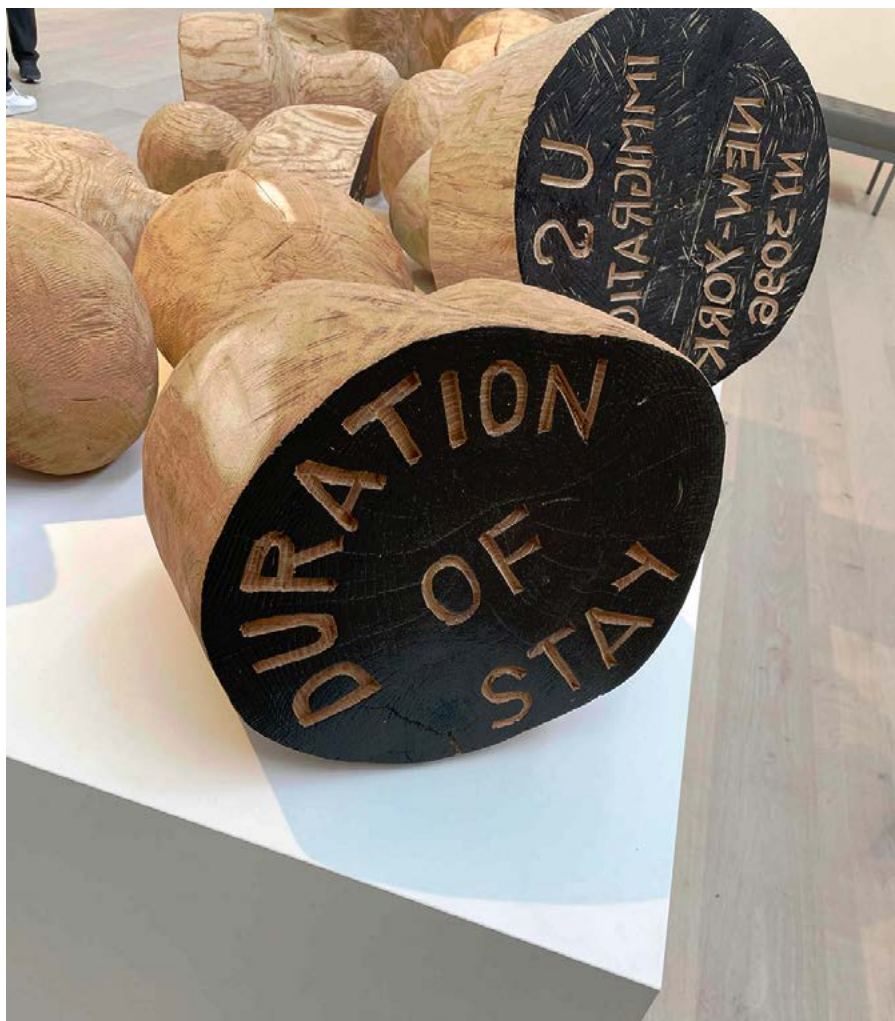
Mahbubeh Moqadam: Ladan 对于筋疲力竭的反思让我深有共鸣。在我自身的研究中，我亲眼见证了主流认识论如何限缩了何谓「有价值的知识」。我将研究紮根于跨国女性主义与反殖民视野，不将全球权力动态视为外部限制，而是将其视为伊朗知识如何被生产、流通与接收的核心。

身为离散学者，我受益于诸多形式的能见度——平台、语言优势与出版机会——而这些往往是我所研究的、那些生活与反抗着的人们所无法获得的。然而，制裁、美伊紧张局势、审查与监控，依然持续限制着我或起档案、进行田野调查，以及与伊朗学者合作的可能。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倾向于赋予自由派与体制化知识特权——亦即那些以法律、政策或改革为核心的知识——却忽视了情感、记忆、美学与日常抗争的政治意义。我的研究坚持认为，这些较不易被解读的实践在政治上至关重要。这不仅是理论立场，更是对伊朗特殊处境及其催生出的抗争创造策略的反映。

这也是一种伦理承诺：拒绝榨取式的框架，并转而聚焦在植根于身体经验的认知形式。这是一种女性主义式的拒绝——拒绝让研究仅在由全球北方所定义的框架下，才被视为具备可理解性的。■

> 劳动迁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学

Karen Shire,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德国;
Heidi Gottfried, Wayne State University 以及拉塞尔塞奇基金会, 美国;
Rina Agarwal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国



艺术展览会的展品印章。
图片来源: Karen Shire

数世纪以来, 移民始终在机遇与诅咒这两极间摆盪。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 从欧洲迁往南亚、东南亚、美洲及非洲的移民潮, 为欧洲移民提供了新的资源、土地与机会; 然而, 同样的移民流动, 对于移入国的原住人口而言, 却意味着征服、土地剥夺、疾病、暴力,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彻底的文化灭绝。十八至十九世纪间, 从非洲与南亚被迫迁往非洲其他地区、亚洲乃至美洲各地的移民, 为移入国的定居者带来了财富, 却为移民自身及其后代带来了惨无人道的暴力与尊严贬抑。今日, 我们正见证着同一道难题

的另一种版本: 对数十亿人而言, 移民是经济生存与人身安全的唯一出路; 但同样的移民潮, 却为数十亿本地人口带来深层的不安全感与焦虑。这些紧张局势正驱使一个接一个国家相继陷入由仇恨煽动的右翼联盟。现在是时候提出一套新的分析视角来检视移民问题了, 而社会学家正处于承担这项挑战的最佳位置。

本专题透过关注国家、政策、行动者, 以及那些试图透过境内或跨国流动改善生计的人所面临的挑战, 深化对劳动迁移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社会学



分析。以下文章源自 2024 年夏季于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举办的「移民劳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讨会，该会议由国际社会学协会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RC02) 及世界社会基金会 (World Society Foundation) 共同主办。这些研究探讨了：移出国及其外移政策、外资流动资本、城乡迁移与跨境迁移的复杂交织（特别是涉及全球南方的流动）、移出国与移入国比较、高学历与低薪迁移，以及上述因素如何形塑移民的期待与生命轨迹。文中涵盖的国家遍及多元社会政治地理，揭示了世界体系中错综复杂的区域内与跨国移民潮。

> 分析移民—发展体制

移民社会学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创新，是转向将劳动力移民对移出国的角色与影响进行概念化。在这些国家中，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与移民紧密结合，形成了 Agarwala 称之为「移民—发展体制 (Migration-development Regime)」¹。正如 Agarwala 在本专题首篇论文中所述，有三个核心问题引导着对该体制的研究（无论是该概念最初的发源地印度，或是其他开发中国家）：第一，谁从移民中获益；第二，移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第三，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联是如何不断变化的。

揭示谁从移民中获益，有助于正面形塑公众舆论对移民的支持。审视移民的后果，特别是其与社会阶级阶层及精英联盟的关系，能让我们深入了解「移民作为增长模式」的运作方式及其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最后，研究移民—发展体制如何随时间演变，则能为移民如何惠及社会发展提供替代性的想像。

在研究印度向海外低薪产业的移出移民时，Kumar 检视了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是否存在双边协议——这类做法至少在名义上承诺能确保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然而，Kumar 发现这些协议未能充分考量印度移外劳工的健康与安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制定保护措施时，不仅没有向移民组织与工会谘询，也没有让他们参与其中。对印度政府而言，移出移民具备多重目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其在国内外的政治合法性，并使大众认同这种新的「新自由主义惯习」。

> 家务与照护劳动迁移

关于移工流动性的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追踪照护迁移的后果：一方面是原籍社群因人口流出而留下的照护缺口；另一方面则是目的地国的社会不平等，在那里，剥削性的劳动条件根植于全球社会与种族的阶层体系。本系列关于家务与照护迁移的论文，致力于对全球南方内部的流动进行跨国比较，并对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跨境移民进行比较研究。

Vega-Salazar、Moreno、Castiblanco-Moreno 和 Pineda 的研究显示，拉丁美洲女性的「南南流动」模式，系统性地偏离了长期主导照护迁移研究的「南北流动」路径。全球照护链并非单纯的生殖劳动转移系统。大批迁往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女性在移民时，往往带着子女与其他受抚养的成年人，这意味着他们将原有的家庭照护责任一并带到了异乡。然而，在当地的照护工作领域中，流离失所的哥伦比亚女性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该领域普遍存在的非正规移民与非正式性，则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移民女性的工作条件与生计安全。

Na 与 Ye 则比较了东亚与东南亚的模式，即中国内部的农村向都是照护迁移，以及从低收入国家前往新加坡的跨国性家务移工。在上述两种语境中，「流动发展主义 (Mobile developmentalism)」² 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极为相似：它们皆将流动的家务移工定位为「较不现代」的一群人，从而认为他们不配获得体面的工作，也不配受到那些聘僱他们的现代都市家庭的公平对待。

> 质疑对受过良好教育与技术移民的假设

两篇投稿文章聚焦于对受过良好教育与技术移民的分析，这类群体在移民研究中仍相对被忽视，对于针对海湾国家移民的研究而言更是如此。Paul、Yavaş 与 Park 探讨了他们对于中东、北非 (MENA) 及南亚移往杜拜之外籍专家移民的研究发现：杜拜是一个比传统全球北方劳动市场更受青睐的目的地。尽管杜拜的职业发展与生活水准与全球北方无异，但来自中东、北非及南亚的外籍专家认为，杜拜的地理邻近性便于家庭探访，且对宗教与族群认同具备更高的包容性，使其成为比全球北方更好的首选目的地。然而，这种条件并不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他们在杜拜所遭遇的歧视与全球北方无异。像杜拜这种全球城市，是大量服务于菁英外籍人士的低薪移民吸纳地，进而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女性化的再生产服务经济。

Xu 比较了中国教育移民的动机，这些移民在中国境内以及跨国前往加拿大的流动中都十分活跃。过去的研究普遍认为，获取加拿大公民身份或中国的城市户口都记，是跨国及国内教育迁移的主要动机。然而 Xu 发现，农村教育移民更感兴趣的是毕业后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前景，而非户口登记状态的改变。与此同时，前往加拿大的教育移民，以及从中国农村移居加拿大的中国人，均偏好选择永久居留权而非公民身份，因为外国国籍可能会限制他们返回中国的流动性，并削弱其过上跨国生活的能力。

> 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案例

Lai 与 Siu 的最后一篇文章特别关注中国在柬埔寨的直接投资——佔成衣业的 90%，并佔所有外资工厂的 55%——如何强化柬埔寨当地的威权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依赖外资的经济增长被置于劳工权益与民主参与之上。虽然柬埔寨成衣工人持续与剥削抗争，但随着该国致力于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吸引并安抚中国投资者，罢工事件已大幅减少。由此产生的移民—发展体制，与早期关于拉丁美洲及其他东南亚地区背景下的依附发展研究极为相似。

> 意识形态与政策决定了移民是促进社会流动，抑或仅强化了既有的阶级结构

这些论文所揭示的未来移民社会学研究新路径指出：移出国与移入国的国家角色，及其发展与投资模型，对于决定移民究竟是开启社会流动与生计安全的契机，抑或导致本就脆弱的移民陷入不稳定生计的陷阱至关重要。社会阶级、性别与族群因素——尤其当族群身份与原籍国与目的地国的收入水平差异重叠时——强烈地塑造了移民可能产生的后果。尽管受过教育的移民最有可能从中获益，但这仍取决于他们在目的地劳动力市场中是被整合还是被排斥。

发展意识形态与政策，决定了移民究竟是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契机，还是固化了性别、阶级和族群的层级体系。然而，关于安全且有序移民的国际治理，尚未能为从事低薪工作的移民提供公平和保障。此外，目的地国家的政策也未能向技术移民提供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和政治保护。就边界化以及包容与排斥的问题而言，境内移民与跨国移民的后果极其相似，两者在诸如家庭、照护劳动以及低技术制造业等领域中相互交织。在越来越多的脉络中，南南流动以及迁出与迁入并存的交会现象，进一步凸显了我们迫切需要更多针对形塑全球移民经历的制度与实践进行深入研究。■

来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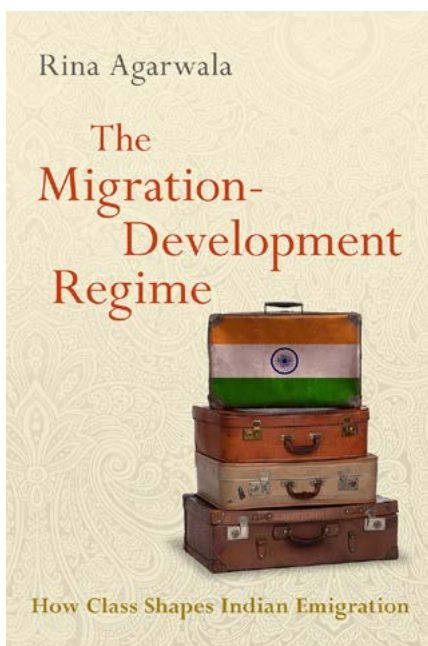
Karen Shire <karen.shire@uni-due.de>

Heidi Gottfried <ag0921@wayne.edu>

Rina Agarwala <agarwala@jhu.edu>

> 社会学领域对移民挑战的贡献

Rina Agarwal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国



Rina Agarwala 的《移民发展体制》书籍封面，牛津大学出版社。

全球移民是本世纪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此议题影响着选举结果，人们对此的观点更使国家、社群乃至家庭陷入分裂。那么，社会学如何协助我们应对这项挑战？

数十年来，社会学家引导我们将视角从单纯观察个别移民，转向理解催化国内与全球移民流动这类更广泛经济社会力量。理解这些结构性因素有助于厘清：谁在迁移、他们如何迁移、迁往何处，以及为何人们甘愿承担代价与风险仍选择迁移等问题。例如，社会学家分析了促使特定族群做出艰难且往往危险的决定——离开家园与亲人——的各种「推力因素」，包括经济贫困、疾病爆发、土地剥夺与暴力冲突。社会学家亦强调了各种「吸引因素」——例如法律与制度框架、劳动力需求——这些因素促使人们选择特定能接纳移民的地区而非其他地区。社会学家深知人类并非纯粹的理性行为

者，因此亦研究了各种中介过程——例如族群网路、文化亲和力、家庭层级决策组合——这些因素即使在迁移路径并非最具成本效益或毫无风险时，仍能驱动特定移民流动。

但身为社会学者，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在近期著作《[移民发展体制：阶级如何塑造印度移民](#)》中，我提出移民发展体制（Migration-Development Regime, MDR）的新分析框架，运用社会学从三个重要面向拓展研究视野。

> 谁从移民制度中获益？

首先，我们必须运用社会学对权力的理解，揭露那些不单只有承受损失、但同时也由移民群体中获益的非移民行为者。尽管围绕移民的公众与政治争议已表明，移民的影响显然远超实际迁徙的人群，当前的辩论却往往聚焦于所产生负面的成本。但若我们能精确指出非移民群体中的受益者及其获益方式，将更能解释为何移民潮在成本与风险并存下，仍持续流动。而凸显这些受益者及其获益途径，是有助提升公众对移民的支持度。最终，揭露这些受益者与利益关系，更能精准界定需要保护的领域。

那么是哪些非移民群体从移民中获益呢？全球移民案例显示：本地雇主常透过廉价移民劳动力在有偿生产领域获取经济利润，并实现基于种族与性别的社会地位流动。社会学研究亦揭示：本地家庭借由依赖移民照料长者、幼童乃至自身，在有偿与无偿的生殖领域中扩张了基于种族与性别的权力。

MDR框架凸显了移民社会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另一受益者：国家。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接收国与输出国的「移民国家」始终掌控着谁享有跨越特定国界的权利。尽管「跨国主义」概念日益受到关注，民族国家仍是唯一具备合法权威来规管、限制与治理跨境人口流动的个体。然而此类治理代价高昂，国家为何仍坚持推行？本文以印度自1833年至

>>

今作为移民输出国的案例为例，阐明印度政府如何持续将移民外流作为实现国内经济增长、巩固政治合法性（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以及为新规范、习惯与实践争取社会认同的媒介。例如，印度移民曾协助宣传二十世纪初的反帝国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1970年代的民主运动。近年来，往返印度与海湾地区的贫困移工，更在传播创业精神与自给自足理念的同时，形塑出全球性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

然而，未来研究仍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被解答。越来越多国家同时扮演移民输出国与接收国的双重角色，那它们如何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职能？国家层级的移民治理体系与次国家级单位的移民治理体系存在哪些差异，又可能产生哪些冲突？而，移民治理框架是否要求我们打破当前国内移民分析与国际移民分析之间的壁垒呢？

> 移民制度的具体后果究竟为何？

其次，透过凸显移民的实际受益者，我们也能更精确地揭示移民的具体后果（无论预期与否）；进而更能凸显那些待解决的问题本质。

以印度为例，我运用MDR框架论证：自1830年代至今，印度国家的移民政策与实践所产生的关键后果，在于持续加剧并巩固印度公民间基于阶级的不平等。例如，英国殖民当局在1833年废除奴隶制后，鼓励贫困印度劳工外移担任种族化的劳动力（包括契约佣工、非正式雇佣及中产专业职位）。然而自1900年代至今，印度政府一方面以法律限制贫困公民海外移居，另一方面却允许精英阶层自由迁徙。这些流动限制虽打着保护与民族主义的旗号，实则构成我所称的「家长式保护」，进而深化了印度国内乃至全球的阶级不平等。

与此同时，自1980年代以来，印度国家赋予其精英移民与印度商界及政府领袖建立所谓「精英契约」（elite pact）的权能，此举首次自19世纪以来重塑了印度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定位。基于印度政府的移民政策与实践，印度裔美国人尤其成为关键的跨国媒介，将新自由主义理念与私有化、自给自足、意志主义（voluntarism）等实践模式，从美国精英圈层传递至印度精英阶层。此举重塑了印度企业、公民社会组织、教育体系、医疗保健、税法规范及房地产市场，使印度蜕变为新型全球经济行为体。英国那位印度裔、印度教背景的**前首相**，正是此类跨国媒介渗透亲密领域的典范——他娶了印度公民为妻，其妻恰是印度最成功资讯科技公司创办人的女儿。

然而关键问题仍待解答：若MDR框架能揭露阶级不平等，是否也应揭示移民制度中基于种姓与性别的后果？移民国家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巩固这些阶层结构？

> 移民制度如何改变？

最后，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深谙结构与能动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深知权力既可自上而下施加，亦可自下而上运作。因此，MDR框架将移民国家视为斗争场域，而非静态实体。在移民研究中，我们不仅需揭示政治经济结构如何自上而下塑造移民，更须呈现移民如何自下而上重塑国家与经济结构。正因国家与移民间存在此种辩证关系，移民治理制度随时间演变。以印度为例，本书追溯了自1830年代至今三种截然不同移民治理制度的兴衰历程。未来研究应追溯各国及次国家区域移民发展路径的历史转变，并借此历史轨迹构思多元的未来可能性。

数十年来，社会学家们对我们理解全球移民现象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当代挑战正呈现新态势，我们的研究极需注入新思维。MDR框架提供了一种新工具，有助于拓展未来的研究视野。■

来信寄至：

Rina Agarwala <agarwala@jhu.edu>

印度国家机器如何想像与落实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

Ashwin Kumar, 康乃尔大学, 美国。



飘扬的印度国旗。图片来源：Ragu Raja, 由Pexels提供。

过去几十年来，大量文献探讨了国家，特别是移工输出国，在管理移民以达成各种政治与发展目标上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安全且有秩序的移民之呼吁，是伴随着移民与发展如何相互连结的[论述](#)而产生的。2015年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以及2018年通过的《全球移民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勾勒出「安全、有秩序且负责任的」移民典范。

本文探讨此框架在实务上的现实情况，以及国家与地方政府如何构思并执行相关计画以达成这些目标。具体而言，我检视了全球最大的移工输出国—印度，如何透过向潜在移工传授具备市场价值的技术，来展望安全与符合伦理的移民。为此，我访谈了主要移工输出地区（德里、喀拉拉邦与泰伦迦纳邦）的劳工组织，以及联邦与邦层级的技术和招募机构。

「技术与移民生态系统」在安全且有秩序移民上的承诺与限制

正如 [Rina Agarwala](#) 所主张，无论是殖民时期或后殖民时期的印度政府，向来都会介入并参与其移民人口的事务，以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这种介入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确保移工的安全。

近年来，印度政府试图透过提供移工具市场价值的技术，并透过与接收国谈判达成的双边劳动力协议 (Bilateral Labor Agreements, BLAs) 之官方管道来输出移工，借此促进符合伦理的招募。尽管这些协议的执行力有限，但其宗旨在于确保双方就安全与合伦理的招募实践，以及目的地国家的工资与工作保障，达成一套双方同意的规范。截至2025年2月，印度联邦政府及部分邦政府已与[德国](#)、[以色列](#)和[日本](#)等国签署了以技术为基础的双边劳动力协议，涵盖建设、电机、技术工作及医疗照护等广泛的职业与产业。印度政府主张，透过这些协议，他们也能借由监督与偶尔的[合作](#)，更好地控制仍主导招募市场的私人仲介机构运作。新的参与者（即[联邦与邦政府机构](#)，以及私立技术发展机构）如今已进入了这个「技术—移民」生态系统。

>>

然而，在印度支离破碎的联邦制移民管理框架内，实施这些计划充满挑战。联邦与邦层级的行动者不仅追求不同的目标与策略，政治立场也各异，导致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竞争与混乱。我对联邦与邦层级技术培训机构的访谈显示，它们之间竞争激烈，不仅相互争夺合约与机构声望，还要与数量庞大的现有私人招募和技术培训机构竞争。这导致他们缺乏合作，并在移工技能培训标准上造成混乱。例如，近期签署的「印度－德国」协议要求在招募前，必须达到严格的技能与语言培训标准；然而，历史较悠久的「印度－以色列」建设劳工协议，却仅要求进行粗浅的任务导向测试。

＞ 前往危险地区进行「安全」迁移的实务性与伦理

事实上，印度－以色列协议引发了关于何谓安全与合乎伦理之劳动力移民的巨大争议。当我向官员质疑将印度工人送往武装冲突区域的安全性时，联邦与泰伦迦纳邦机构皆以他们有确保政府严格监督来为其决定辩护。他们表示，工人将获得优渥的薪资，该协议甚至涵盖了他们的食宿。万一工人陷入危险处境，印度领事馆将照顾他们的需求，包含在必要时进行撤离。

另一方面，喀拉拉邦的机构确实对该双边协议的安全性与伦理提出了质疑。相较于联邦政府对该冲突采取较为模稜两可的立场，喀拉拉邦首席部长于2023年12月正式谴责了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击。喀拉拉邦政府的招募机构证实，在首席部长发表声明后，他们拒绝在该协议下将工人送往以色列。正如一位喀拉拉邦的政府招募专员所主张的：

「我们（政府机构）应该专注于将工人合乎伦理地招募至各个目的地。将他们送往激烈的战区，完全违背了任何形式的伦理！」

印度政府无力保护工人的程度，也明显体现在僱用与解僱的实务操作上。首批工人抵达以色列几个月后，一份调查[报告](#)发现，近2,000名印度工人被当地的以色列承包商解僱，导致许多人完全被驱逐出以色列。雇主以「缺乏技术」作为解僱的理由。而政府对此情况几乎无能为力，无法进行补救。这一事件揭露了该计划在促进「安全、有秩序且负责任」移民之愿景中的几处裂痕。

＞ 纳入劳工声音

最后，除了联邦与邦政府之外，公民社会也至关重要。传统上，劳工组织、公民团体以及跨国劳工网路在捍卫移工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访谈显示，随着政府对移工劳动力的管理扩张，移工组织者的声音却被削弱了。例如，印度工会反对印度与以色列的协议，主张助长对巴勒斯坦人持续的压迫是完全不道德的。然而，工会与其他移工组织证实，在制定这些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并未咨询他们的意见。

组织者指出，任何迈向移工安全与合伦理招募的举措，都需要考量在第一线捍卫移工权利的人们的洞察。在全球边境日益紧缩的背景下，将他们纳入讨论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在跨国层级。除了培训移工并将他们与有意愿的雇主进行媒合之外，任何实现安全且有秩序移民的希望，都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愿景，以确保移工的权利。■

来信寄至：

Ashwin Kumar <ak2398@cornell.edu>

> 跨越国界的关怀： 移民至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女性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安地斯大学, 哥伦比亚; Carolina Moreno, 安地斯大学, 哥伦比亚;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 德拉萨大学, 哥伦比亚; 以及 Javier A. Pineda D, 安地斯大学, 哥伦比亚



森林中的安置帐篷，衣物晾晒在人行道上方。
图片来源：Luna Andrade Arango，由Pexels提供。

十一世纪之交，社会学家 Arlie Hochschild 提出「全球照护链」概念——指女性跨越国界转移照护责任，通常从较贫穷国家流向较富裕国家的跨国网路。这个概念激发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领域，深入剖析性别、阶级与移民如何与照护工作相互交织。既有研究多聚焦在南北移民：全球南方女性移居富裕国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然而当照护链在南方国家内部运作时，又会产生何种现象？拉丁美洲学者正深入探究此议题，揭示智利、巴西、阿根廷乃至近期哥伦比亚等国间错综复杂的移民与照护模式。

本文将焦点转向「南—南迁移」，并以自2015年以来大量迁移至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女性

为案例。截至2023年底，已有将近290万名委内瑞拉人移居哥伦比亚，其中女性人数略多于男性。这些女性中的许多人不仅要应对不稳定的移民政策和充满敌意的劳动市场，还要肩负有酬与无酬的照护角色。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必须对全球照护链理论进行修正，以反映全球南方区域性、女性化且通常具有循环性迁移流动的现实。这些照护动态并不总是遵循在较富裕国家观察到的相同模式。例如，女性移工经常与孩子一起旅行、在目的地国组成多代同堂的家庭，或是继续在她们自己的家庭内提供照护。在这些脉络下，照护工作是被重新配置的，而不仅仅是被转移。



＞ 哥伦比亚的照护工作：一个复杂的地景

长期以来，受武装冲突所引发的内部流离失所深刻形塑了哥伦比亚社会，造就大量女性从事非正式照护与家务劳动。如今该国更成为国际移民，尤其是委内瑞拉女性的主要目的地。

起初，哥伦比亚政府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来应对委内瑞拉人的涌入。随后，政府引入了合法居留正常化的机制，特别是「临时保护许可证」(Temporary Protection Permit, PPT)，提供了工作机会与基本服务的管道。然而，行政延宕、政治意识的转变以及有限的执法力度，使得许多移民缺乏合法文件，并容易受到劳力剥削。

这在照护经济中尤其明显。根据哥伦比亚官方家庭调查(GEIH)的数据，我们发现，尽管委内瑞拉女性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她们在房务、餐饮与零售等低薪、非正式部门的比例却不成比例地高。令人意外的是，家务工作并不是这些女性的主要就业领域。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哥伦比亚国内流离失所的女性](#)所填补，这反映了哥伦比亚的内部冲突如何塑造了其自身的照护劳动市场。

从事家务工作的委内瑞拉女性通常比哥伦比亚籍同业更年轻且教育程度更高，但她们面临更高的非正式就业率，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例如，在2023年，有40%的委内瑞拉家务工人没有医疗保险，且尽管她们承担全职工作量，却只有7%的人加入了退休储蓄系统。她们大多数只有口头劳动契约，这进一步加剧了她们不稳定的处境。

＞ 数据之外：女性主义的批判

本研究呼吁采用更具交织性的取径来分析照护工作。性别并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变数。国籍、合法身分、种族、年龄与教育程度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照护责任的分配方式，以及谁会被排除在外。

委内瑞拉的案例也引发了对当前移民与劳工政策永续性的质疑。哥伦比亚从人道援助转向「社会经济整合」的政策目标，至今尚未转化为对女性移工具实质意义的保护或工作机会。最近，政治风向的转变导致了呼吁委内瑞拉人自愿返国的声音，尽管该国仍持续处于动盪之中。

我们主张，哥伦比亚等国家不应依赖临时许可证与政治裁量权，而需要制定健全且永久的移民政策，以认可照护工作的价值，并确保提供照护者（无论其文件状态为何）的权利。

＞ 反思全球南方的照护链

这项研究充实了日益增加的拉丁美洲学术文献，这些文献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照护移民模式。我们不能预设劳动力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单向流动，而是必须承认区域脉络中动态且多层次的照护现实。在哥伦比亚，照护既是输出的也是输入的：虽然许多哥伦比亚人作为移民逃离了该国，但该国也正接收大量来自国外的照护劳工。

此外，全球南方的照护工作往往受到流离失所、不平等与国家忽视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就业问题，更是女性之间的生存与社会连带问题。照护工作透过非正式网路、家庭安排与社区策略来分配，通常缺乏国家的支持。

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女性正在重新定义作为移民与照护者的意义。她们的经验挑战了全球照护链的简化模型，并邀请我们不仅将照护视为劳动，更将其视为政治斗争与社会转型的场域。透过记录这些现实，本研究呼吁建立一个更接地、更具包容性的移民与照护社会学，将在移动中生活之女性的声音与主体性置于核心。■

来信寄至：

María Camila Vega-Salazar

<mc.vega611@uniandes.edu.co>

Carolina Moreno

<camoreno@uniandes.edu.co>

Suelen Castiblanco-Moreno

<secastiblanco@unisalle.edu.co>

Javier A. Pineda D.

<jpineda@uniandes.edu.co>

> 「流动发展主义」式 中国和新加坡移民照顾劳动力

Lynn Yu Ling Ng,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和 Yunhui Y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加拿大。



家庭劳工的假期。

图片来源: Rex Pe, 由创用CC CC BY 2.0提供。

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使照护工作以及我们对移民家事劳工的全球性依赖再次受到关注。然而，尽管存在共同的困境，这些劳工的经验却很少在不同国家情境之间被加以分析。在东亚、欧洲，以及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中，关于此议题的学术研究已经有活跃的发展趋势，但在主流研究主题中仍然相对边缘。我们透过将中国的家庭照护工作者（domestic care workers, DCWs）与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劳工（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FDWs）的案例，参与到此重要的讨论之中，以揭示相似的经济策略如何创造出类似的剥削形式。

> 视农村／传统为「落后」、 城市／现代为「优越」的过时模型

在《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and Globalisation》期刊即将推出以「家庭空间」为主题为的专刊，我们将发表〈Same but Different: Care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and Singapore〉一

文。该文中，我们借鑑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线上民族志研究，比较跨越国界的家务劳工经验，揭示根植于发展意识形态中的共同剥削模式。我们说明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流动式发展主义（mobile developmentalism）」的情境：这是一种线性且分阶段的发展意识形态，其依循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将农村／传统的人与城市／现代的人分别建构于较低等与较优越的地位。

移民的流动性受到此类社会阶级制度的影响。在中国，农村家务劳工因被认为具有较低的「素质」（suzhi，人品）而受到歧视。在新加坡，外籍家庭劳工（FDWs）被理解为来自亚洲「较不发达」的地区。这两群移民女性都受到我们所称的「流动式发展主义」所支配；在这种殖民式文明排序中，某些人被视为天生就比他人更「现代」或更「发达」。

这种排序体系并非偶然。它源自战后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讚颂从「落后的」农村／传统社会走向「先进的」城市／现代社会的线性发展。无论劳工是跨越国际边界移动（新加坡案例），或是在国内的城乡分界之间移动（中国案例），他们都面临类似的对其人性与劳动价值的贬低。

> 理解照护危机

国家利用发展策略来正当化对女性及其所从事的照护工作的贬低。经济现代化与「提升」国家发展的目标，是整体图像中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唯一因素。在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照护工作如何被系统性地贬低已有相当丰富的学术讨论。无论是中国农村女性还是亚洲移民女性，照护劳动都因为性别化意识形态被忽视且容易被剥削；这些意识形态将有色女性描绘为天生特别适合于他人服务。这种现象反映了全球对照护工作价值的普遍缺乏。照护被视为女性的「天职」：一种

>>

由「爱」所驱动、似乎可以无限供应且自由流动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应当获得公平报酬的劳动。

> 素质（人格品质）的概念与「较不发达」的亚洲

中国的户口（hukou，户籍）制度建立于1950年代，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城乡隔离。农村移民可以在城市工作，但无法获得城市福利，例如医疗保健、子女教育或社会保障。素质（suzhi）论述将农村人口描绘为「低素质」：缺乏文明素养、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隔离。

一位家庭照护工作者曾勇敢地对此提出挑战。当她的雇主拒绝给她元旦假期时，对方问道：「作为一个保姆（Baomu，对家务劳工的贬抑性称呼），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法定假日？」她反驳道：「保姆难道不是中国公民吗？如果是，那她们就有权享有法定假日。」她的反抗最终让她失去了这份工作。

在新加坡，外籍家庭劳工则面临种族歧视，因为他们来自「较不发达」的亚洲国家。招聘网站像商品比价一样展示她们的照片、个人资料和「技能」。国家规定的强制同住政策以及雇主担保制度——类似于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建立了一种依附关系，使得劳工即使在面临虐待时，也难以轻易更换雇主。

中国的劳工是在自己国家内部移动，相同族裔的公民。他们在新加坡的同行则是跨越国界的外国公民。这两个群体都面临类似的挑战。

法律脆弱性（Legal Vulnerability）：在中国，超过90%的家务劳工缺乏正式的雇佣契约，因为只有公司而非家庭可以被承认为雇主。同样地，虽然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劳工（FDWs）有劳僱契约，但她们被归类为签证最低级别的临时「外来工（guest workers）」，且每两年要续签一次。

同住剥削（Live-in Exploitation）：这两类家事劳工通常都与雇主家庭同住，因此被期望24小时待命。一位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劳工（FDW）分享说：「我凌晨四点起床做早餐[...] 我的休息时间从晚上11点到午夜12点，取决于他们下班回家的时间。」一位中国的家务照护工作者的诗中写道：「当我的头碰到枕头时，已经是十一点。筋疲力尽，满身汗水，我躺在床上，思念着家。」

去人性化的对待（Dehumanizing Treatment）：这两个群体都面临根植于发展意识形态的居高临下态度。中国的雇主批评家务照护工作者的普通话「不标准」，并强迫她们练习说话标准。新加坡的雇主则认为外籍家庭劳工（FDWs）需要「管教」才能适应城市生活，批评她们的卫生习惯、对现代电器的熟悉度以及「悠哉」的农村生活方式。

> 私人空间与发展意识形态下的剥削： 将移民照护工作者视为较不值得尊严与保护的人

我们的比较视角关注国家层面在国际移民中的作用。无论是国内移民（中国）还是国际移民（新加坡），都揭示了不同尺度与情境下的发展意识形态。两者都创造了可以称为「家庭空间」的情境：在这些私人空间中，剥削在超越公共监督与劳动规范的环境下滋长。全球发展策略创造了地方阶序，为将某些群体视为可随意处置的劳动力提供了正当理由。无论这种正当性是基于城乡发展差距或是国际发展差距，结果都是相似的：女性的照护工作成为一种商品，被榨取以支持其他家庭的社会再生产。

理解流动式发展主义有助于我们看到看似不同情境之间的连结。中国的家务照护工作者（DCWs）为基本劳动权利而奋斗，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FDWs）为公平待遇组织行动，她们面临的挑战相似——这些挑战根植于发展意识形态，将她们定位为天生较不值得尊严与保护的人。

最终，认识这些相似之处有助于开启跨国及关系性的团结与跨情境学习的可能性。这两群女性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利用线上空间分享经验、提供相互支持，并记录不公。她们的声音挑战了对照护工作与劳动剥削的主流贬低，并要求对她们的完整人格给予承认。■

来信寄至：

Lynn Yu Ling Ng <lynnngyl@yorku.ca>

Yunhui Ye <yunhuiye@uvic.ca>

> 杜拜对非西方外籍人士的独特吸引力

Anju Mary Paul、Mustafa Yavaş 和 Sejin Park,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 阿拉伯联合大王国

自 从 Saskia Sassen 的经典著作将纽约、伦敦和东京描述为全球城市以来，其他全球城市也被辨识并进行排名，而这些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经济标准来进行的。作为企业全球化的节点，全球城市聚集了许多由高技术移民所经营的领先跨国企业。在这些城市竞相吸引人才的过程中，评估和排名它们的分析师，甚至试图推广它们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使用普遍化的标准，彷彿所有外籍人士都符合相同的模式——只追求高收入、舒适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安全性。即使是对全球城市文化意义的评估，也往往以它们拥有多少博物馆和地标来衡量。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全球城市是否还有其他「独特」的特质，能够提升其对特定高技术移民群体的吸引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考察了杜拜的案例，这座在全球城市排名中迅速崛起的城市。通过对在杜拜的非西方移民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我们发现，杜拜同时作为一座全球城市与一座「在地」城市，对来自南亚、中东与北非（MENA）地区的外籍人士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作为一个典型的全球城市，杜拜提供了：(1) 更高的经济收益、(2) 更高的生活水准，以及 (3) 更高的安全性——而这些通常是移民所联想到的特征，也是被建构出的「全球北方」的样貌。但杜拜同时也为这些移民提供「在地」的好处：(4) 地理位置上靠近他们的原籍国；(5) 文化上的熟悉感，因为当地有来自这些地区、规模庞大且历史悠久的移民人口；以及最后 (6) 对这些移民的特定宗教与种族身分具有更高层次的包容。

> 杜拜的背景

拥有350万人口的杜拜，是阿拉伯联合大王国（阿联酋）最大的城市。在过去二十年间，杜拜迅速发展为跨国企业在中东与北非（MENA）地区营运时首选的区域总部所在地。这座城市以自己是中东地区最具商业友善度、最自由开放的枢纽而自豪，并且在公共安全、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宜居性方面持续获得高分，而这些都是评估城市对外籍人士友善程度时常用的标准。

同时，杜拜（以及阿联酋其他地区）仍然严重依赖外籍人士来维持其经济成长。在2023年，杜拜人口中有 92% 为非阿联酋公民。虽然人们

对杜拜外籍人士的普遍印象多是来自西方的人，但实际上，更多的人是来自南亚以及中东与北非（MENA）地区。

> 另一种类型的外籍人士

为了评估杜拜的相对吸引力，我们对来自阿联酋周边三大区域（南亚、MENA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技术移民进行了调查和访谈。我们将北非国家视为属于MENA的一部分，并与非洲其他地区分开处理，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说阿拉伯语，并且在族裔上被视为阿拉伯人。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移居之前，三个受访群体都对搬到阿联酋表现出强烈的意愿（平均分为3.68分，满分为5分）。然而，来自南亚与MENA的受访者，比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表达出更强烈希望继续留在阿联酋的意愿（3.35分对2.71分）。这种差异与这三个群体在比较阿联酋的生活与先前所在国家的生活时，所感受到的满意度不同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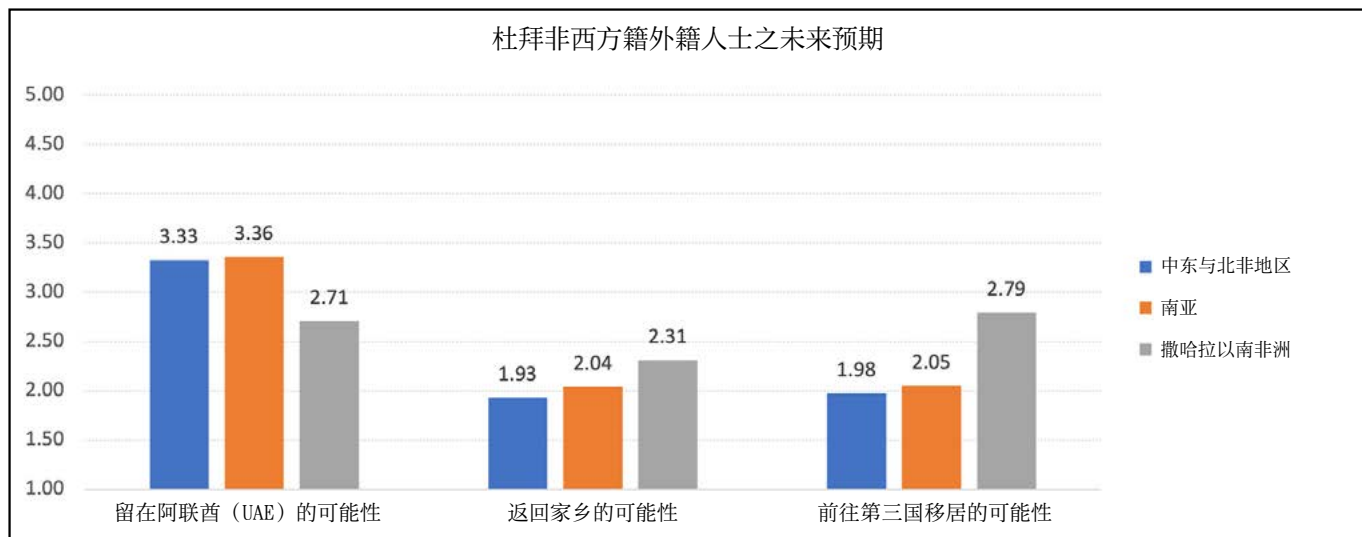
虽然来自南亚与MENA的受访者在抵达阿联酋后，在职业发展、生活水平和文化熟悉度这三个关键面向上，感受到显著的提升；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受访者仅在工作和生活水平方面感受到显著改善，在文化熟悉感方面则没有，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社群规模较小。因此，相较于另外两个群体，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离开阿联酋，前往第三个国家继续迁移。

> 杜拜的经济、生活方式与安全优势

我们对46位在来到杜拜之前曾居住于其他海外地区、具有全球流动性的专业人士进行深入访谈，这有助于进一步解析这些不同的观点。这三个群体都强调他们在杜拜所享有的经济利益、舒适的生活方式以及更高的安全性。这些优势适用于所有在阿联酋以外籍身份工作的高技术移民，无论其原籍国为何。杜拜为外籍专业人士提供的经济收益，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他们在西方国家从事同等职位所能获得的收入，部分原因在于阿联酋的增值税较低，且没有个人所得税。

受访者强调了杜拜的高生活水准，包括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的公共安全感。此外，他们

杜拜非西方籍外籍人士之未来预期



资料来源: Anju Mary Paul, Mustafa Yavaş 和 Sejin Park

还强调, 由于来自亚洲与非洲的大量低薪劳动移民流入阿联酋, 从事照护与服务行业工作, 他们能轻松取得负担得起的家务劳动力。这些特征反映了杜拜名副其实的「全球城市」地位, 该城市在劳动市场的高阶与低阶均拥有大量移民人力。

> 杜拜: 兼具两种优势的城市

来自南亚与MENA的受访者也细说到, 杜拜与他们原籍国的地理位置接近, 这使他们能够享受频繁 (且负担得起的) 回家探亲, 或让亲属透过阿联酋宽松的旅游签证来探访他们。鉴于阿联酋长期聚集着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中产阶级移民群体, 也随着这些社群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与社会机构, 南亚与MENA的外籍人士经常强调杜拜的文化熟悉感, 提到各种便利设施 (从清真寺、提供清真与民族饮食选择的超市与餐厅, 到教授原籍国课程的学校), 这些都使杜拜对他们而言感觉「像家一样」。

最后, 这些受访者谈到, 阿联酋对他们的宗教与种族身份有更高的接受度, 这是他们在许多北方的国际城市中感受不到的。相比之下,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受访者则更可能谈到在阿联酋遭遇的种族歧视, 或者只是因为缺乏同阶层的大型同族社群而感到孤单。

总体而言, 我们的研究结果凸显出, 全球/世界城市的学术研究需要考虑这些城市中高技术移民的多样性, 而不是假设外籍人士都是同质的。在让特定移民群体在海外感到「像家一样」时, 应该更多地承认城市的社会与文化特征, 而不仅仅停留在表浅的世界主义概念上。■

来信寄至:

Anju Mary Paul <anju.paul@nyu.edu>

Mustafa Yavaş <mustafa.yavas@nyu.edu>

Sejin Park <sejin.park@nyu.edu>

> 中国教育移民的 本土、海外与归国历程

Feng Xu,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加拿大。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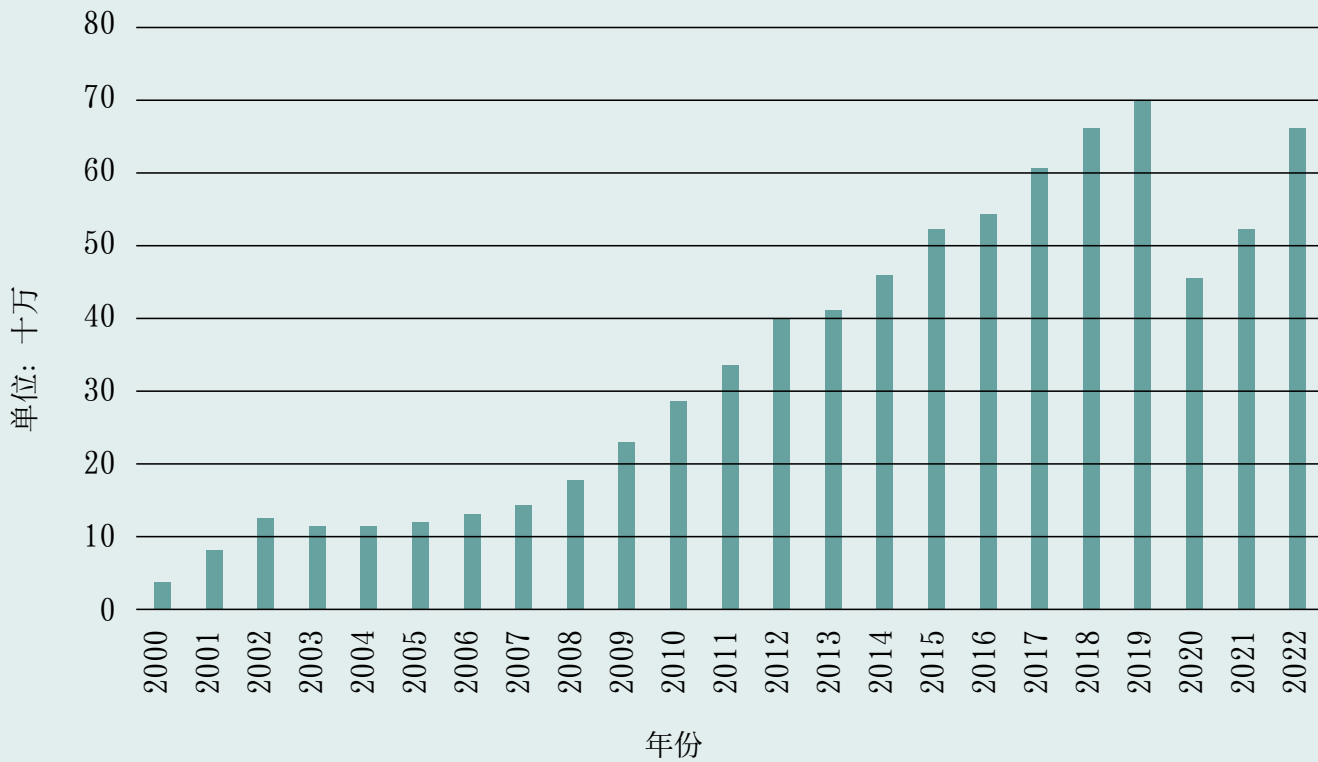
高考 (Gaokao), 湖北日报, 资料来源:
http://m.cnhubei.com/content/2019-06/08/content_10844871.html

众多中国年轻移民透过追求优质教育实现社会向上流动。本研究聚焦国内外教育移民及「归国者」群体。研究聚焦于他们争取当地居留身份的亲身经历：上海或北京户口 (hukou)，以及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尽管加拿大公民身份在功能上可能比永久居留权更接近户口制度，但受访者几乎未提及公民身份；投票权不被讨论，而加拿大公民身份反而使回访中国或未来归国更为复杂。

2024至2025年间，笔者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 访谈十二名、于中国北京与上海访谈十五名中国教育移民。多数受访者生于1990年代，未婚者居多，女性佔多数，且皆具就业或求职状态。

>>

中国教育移民海外人数（2000-2022）



中国与全球化中心，改编自《中国留学生的发展》（2023-2024）。

资料来源：<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514045418/http://www.ccg.org.cn/archives/84327>

另，本研究中为何将两组人纳入同一研究？首先，包容与排斥的「边界实践」既发生于国境线，亦存在于国土内部。其次，国内与国际迁徙经验存在交叠。最后，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连结并非一帆风顺。

流动、交叠的移民经验

我的访谈颠复了「本土」与「海外」移民间的二元对立。除三名「内部移民」外，其余受访者皆曾留学海外后「归国」，但无人返回故乡。与此同时，数名定居北京或上海的「归国者」亦视这些城市为过渡居所，尽管众人皆认同这些都会区具备国际化、高度发展且令人向往的特质。

多数加拿大受访者希望定居当地，但即使持有永久居留权者仍会返乡探访中国亲友，部分人更积极规划待父母年迈时永久归国。（近期研究显示全球逾80%教育移民最终返乡。）整体而言，教育移民的经历呈现出临时性、流动性、交叠性与复杂性。

空间不平等与教育流动性

我的受访者成长于改革时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流动性极高的社会。支撑他们抱负的空间流动性，映照出了尖锐的地域不平等。这种流动性依赖于中国在政策上放宽了户口制度与护照政策、接收主办

国政府开放的人才招募策略，以及更便捷、更廉价的交通通讯手段（高铁、航空、社交媒体）等方式尝试达成政策目标。

当这些教育移民迁徙时，更广泛的迁移压力往往改变了他们的故乡。中国东北的去工业化导致工厂关闭，迫使人口外流。市场与国家驱动的城市化在其他地区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劳动力移民常为家乡亲属建造新房。原先故乡因紧密的社会关系而被人们铭记，如今却也成为被遗弃之地。

研究中对北京与上海的偏好可能受招募标准影响，但此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上海或北京户口持有者更容易进入国内顶尖大学。相对地，像本研究中来自农村或小镇的顶尖移民受访者，通常至少从国中阶段就开始离乡求学并寄宿。

高考（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准备过程耗尽心力，需要大量隐形且被低估的支持：寄宿学校的付费工作者，或是家长（多为母亲）。未寄宿者可能在学校附近租屋，依靠付费或家长支援工作，但清醒时间仍多半耗在校园。因此，赴外求学的中学生在求学期间往往多年足不出户。能进入北京或上海顶尖大学，本身已是成功故事。

许多旅居加拿大的受访者同样在中学阶段开启教育移民之路，其轨迹与中国境内移民相似。然而不同于考入北京或上海顶尖大学所附带的荣耀，入



读加拿大大学作为成功标志的意义则模糊得多。许多四年制大学本科生要么高考成绩不佳，要么刻意回避高考。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唯有中产或富裕家庭能负担全额教育开支。因此当地经济条件较差的研究生常需边读书边打工。成本考量与移民潜力驱使受访者选择加拿大。除阶级攀升外，受访者更常提及个人发展是移居加拿大的动机。

> 边缘实践与永久本地身份的策略构建

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移民无法像教育移民那样寄望于社会向上流动。中国各地政府需要廉价劳动力，却不愿让移民成为永久户口持有者。尽管户口制度的重要性已有所减弱，但它仍关乎若干关键的终身权益，包括子女的教育权利。

相对地，成功取得学历的移工虽享有较优渥的本地户籍途径，却仍面临中国顶尖大学与城市的多重门槛。即便成功取得户籍，大城市户籍持有者仍常嘲讽这些移工的专业技能与超高考试成绩。

有别于加拿大教育移工，中国教育移工毕业后无需本地户籍即可合法留居北京或上海，仅需具备工作与住所证明。而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北京户口仅赋予公务员特权，对私营企业求职者则并非首要优待目标。与低技术移民不同，他们深知优质私营企业职位——而非户口——才能提供私人医疗保险与养老金。本研究中亦发现，本地户口身份主要影响的对象为有子女的移居毕业生，而我访谈的许多对象皆另有规划。

相较之下，对在加拿大的中国教育移民而言，无论出于就业前景、情感纽带或逃离性暴力，永久居留权都是长期居留的关键。理论上，根据加拿大国际流动计划，「国际学生」确实能获得一条通往永久居留权的独特途径。然而，现实中的申请历程却充满变数。加拿大积分制度的频繁调整与近期录取名额的缩减，往往会危及精心规划的永久居留计划。此外，为争取额外积分以获取永久居留申请邀请，受访者常从事当地低技术、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在毕业与获取永久居留申请邀请期间，初期加拿大工作经验对后续转入更稳定职位至关重要。本研究中，除了一位受访者外，其余受访者皆在华人经营企业找到首份本地工作，此类企业鲜少要求加拿大工作经验。部分雇主本身亦为新移民。常见职类包含服务当地华人社群的专业服务，如学生教育咨询、移民服务或餐饮业工作。

> 结论

国际与国内迁移的研究皆与教育移民的经历息息相关。综合研究显示，国家边界并非移民面临的重要障碍核心，权力不平等才是关键因素。中国户口制度不仅划分乡村与城市、不同层级的城镇，更将低技能者与受过教育者割裂开来。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而非最终公民身份）使教育移民陷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常见于社区企业。此外，常态的不稳定性更使他们追求稳定当地身份的过程复杂化。■

来信寄至：

Feng Xu <fengxu@uvic.ca>

柬埔寨成衣业移工： 危脆性与抗议

Tsz Chung Lai 與 Kaxton Siu, 浸会大学, 香港。



柬埔寨农村移工参加劳工权益培训课程。
照片拍摄：Kaxton Siu。

2024年3月9日，约600名受雇于中资持有之永旺成衣公司（Y&W Garment Company）的柬埔寨农村移工，徒步游行至劳工与职业训练部。他们递呈一份请愿书，要求忽然宣布破产并导致工人拿不到最后一个月工资的公司持有人，补发遭拖欠的工资和津贴。当日下午，该部发布声明，要求工人、法律代理人、当地工会以及其余利害关系人立刻结束抗议，并指控他们阻碍交通、造成堵塞。该部建议工人们透过合法管道寻求救济，并强调了「维持公共秩序及保护更广大社群的利益」之重要性。

永旺成衣公司的忽然破产以及伴随的欠薪，鲜明地揭示出柬埔寨成衣业农村移工在外资格局的演变中所面临的危脆境况（precarious conditions）。同时，工人的集体抗议不仅暴露了他们的弱势，也显示了他们在剥削加剧与不安全感升高的情势下动员并展现其能动性的能力。中资持有之

公司的迅速扩张，以及相应的诸如此类的工人抵抗，迫使劳动社会学与工业社会学追问：在中资压倒性的进驻下，柬埔寨成衣业农村移工的当下处境为何？重要的是，工人们如何回应那些由不良工作条件及经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挑战与艰难？而柬埔寨政府对此所采取的立场又为何？

工人的多面向危脆性

当检视柬埔寨成衣业农村移工的当下处境之时，多重及交叉的危脆形式变得明显。根据我们在2023至2024年对分别来自28个成衣工厂的86名工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而易见地，这些工人正面对着严重的职业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由仅足以维生的工资（每月204美元）、泛滥的短期契约（其中有66%的工人签订六个月或更短的合约）以及无所不在的年龄歧视（超过四十岁的工人特别容易遭到裁员或排除）等因素所驱动。工厂经常在

订单短缺期间强制执行轮换停工，每月支付工人的工资低至 40 美元，进一步固化其财务不稳定及不确定性的循环。这一行业深入地嵌入于买家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使国际品牌得以将需求和生产之波动的风险转嫁到那最微弱的人身上：即工人们。

危脆性远远超出工厂大门之外，塑造了移民模式及农户生存策略。77% 的工人是农村移民，双收入对生存来说至关重要：75% 的已婚夫妇共同居住在首都金边（Phnom Penh），但其基本生活开销（双人每月 300 美元）超过了一般工资。为了应付之，许多家庭将孩子留在家乡（37%），依靠祖父母的照护，并在危急时刻需要反向汇款；而有 31% 的工人从农村家庭获取支助。债务是普遍而严重的（取中位数 4250 美元），通常以土地为抵押，侵蚀了工人的长期保障，并由于工资一直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加深营养不良和代际贫穷的循环。这些债务源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就业不足，以及工人们在金边的高成本环境中努力维持生计所致。此外，一些农村移工会借钱购买摩托车及汽油以便往来于城乡之间，特别是那些将孩子及长辈留在农村家乡的人。

> 威权资本主义与柬埔寨官方回应

柬埔寨政府对永旺成衣公司之抗议活动的反应体现了柬埔寨政府在劳资关系方面的威权转向。透过将示威视作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国家预示着对劳工行动主义（labor activism）的收紧控制，同步于区域性的威权资本主义趋势：经济增长与外国投资优先于劳工权利与民主参与。

虽然柬埔寨农村移工具有一个集体抵抗的历史，他们行动的空间却已经大大地缩减。根据 Better Factories Cambodia 的数据，罢工行动从 2013 年的 147 起急遽下降到截至 2018 年 8 月仅剩 9 起，而工作日损失从 889,000 天下降至 42,000 天。提交给仲裁委员会的劳资纠纷从 2016 年的 248 起下降到 2017 年的 50 起。这种下降与其说表明了劳资关系的改善，不如说是国家系统性镇压的结果：逮捕工会领导人、恐吓运动人士，以及将工会拉拢为政府的夥伴，特别是自 2013 年大选以来。

工人组织的法律框架正在逐步被侵蚀，对争端的独立解决越来越少。政府的修辞——强调「公共秩序」和「社群利益」——旨在掩盖一个更深层次现实：国内外资本的利益优先于工人的福祉和权利。

> 危脆性与抵抗之可能

永旺成衣公司的抗议活动为柬埔寨成衣业农村移工在威权资本主义下的多重危脆性及受限的能动性提供了一个视窗。在中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它也巩固了一种近乎完全由工人承担风险和不安安全性的系统。截至 2024 年 10 月，中国资本约占了柬埔寨 2236 家工业工厂 54.7% 的所有权，代表了惊人的 90.86 亿美元的投资。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投资者现在控制着柬埔寨大约 90% 的成衣厂。

这一戏剧性的转变表明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全球领先之投资者的演变。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促使中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柬埔寨等国家，因那里的低工资提供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资本在柬埔寨关键产业中的支配地位迫使柬埔寨国家政策更倾向于资本利益。这一倾向——从其压制劳工行动主义和强调「公共秩序」的作法中显而易见——进一步缩小了集体谈判和工人主导变革的空间。

然而，柬埔寨农村移工的复原力已然存在。他们抗议的意愿、对家庭和社区网路的依靠，以及为公平工资和体面条件而进行的斗争，都表明了强大的抵抗精神。前进的道路将需要新形式的团结和倡议——包括柬埔寨境内和境外——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威权统治所造成的日益深化的危脆性。柬埔寨的案例活生生地提醒了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工作的未来将由资本需求与工人争取尊严、安全和正义的斗争之间的持续竞争所塑造。■

来信寄至：

Tsz Chung Lai <22482261@life.hkbu.edu.hk>

Kaxton Siu <kaxton_siu@hkbu.edu.hk>

＞ 戰爭作為糾纏的累積： 加薩案例研究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图片来源: Markus Winkler, 由Pexels提供。

法律学者对当代社会战争新模式提出关键看法。其中, Masato Ninomiya在[Festschrift](#)中撰写的章节, 将国家复仇、种族灭绝与殖民主义三种视角相互连结。然而在特定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 当过度积累的财富受未来收益的主张驱动, 并于金融化背景下催生开拓新市场的压力时, 这些过程便可重新被解读。此观点汲取Karl Marx、Rosa Luxemburg 与Hannah Arendt的思想, 后经土地掠夺理论([Landnahme-Theorem](#))的论辩重新诠释。该观点主张: 受时空限制制约的资本主义增长, 透过暴力、殖民政政策与战争佔领非资本主义领土以突破藩篱。关键在于如何解读此现象在近期军事冲突中的体现——此问题必须置于金融积累体系中加以审视。

基于货币产权与付息偿还义务的计息资本, 在次级市场中其转化为虚构资本, 借此建立收入流预期, 并透过资本化的潜能来实现收益倍增。此体制透过投资合约的形式, 过度积累对未来剩馀价值的索偿权, 其实现取决于将领土与人口并入价值循环的征用行动。此类并入将剩馀资本导向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与资源开采, 同时借由土地及不动产资产担保的证券创造收入流。

由此观之, 巴勒斯坦的毁灭正是[交织式战争积累](#)的极端案例。

＞ 以色列已成为全球资本的战略枢纽

正如[威廉·I·罗宾逊与阮怀安](#)所指出的,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 中东地区正加

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此前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GAFTA)成立, 并签署了多项双边与多边协定。这催生了由海湾资本(数兆美元主权财富基金)支持的跨战略领域企业与金融投资浪潮, 同时伴随来自欧洲、美洲及中国的资金流动。以色列遂成为全球资本的战略枢纽。

在此背景下, 加萨封锁可被理解为跨国过度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已透过以色列企业复合体显现, 如今正寻求新的价值化疆域。此举实为原始积累的体现: 透过剥夺土地、财货与人民, 将其转化为市场导向的社会关系。

＞ 恐惧恐怖主义与紧急状态为国家复仇铺路

此种剥夺权力之举, 奠基于暂停权利保障的基础上, 使军事机器得以在缺乏制度制衡与保障机制的情况下部署。此项暂停措施仰赖法律机制(紧急状态)予以授权。如最上所阐述的「国家复仇」概念, 精准捕捉了此种转变: 国家对针对人民或财产的政治性暴力行为, 其回应已不再受法律约束, 而是由报复驱动。

哈玛斯袭击后, 班杰明·纳坦雅胡承诺「[强大复仇](#)」, 并援引经文「[要记住亚玛力人对你所作的](#)」, 此经文常被解读为报复的指令。此种框架透过「恐怖主义」的论述诉求煽动恐惧以获取正当性。当主流意识形态将社会恐慌常态化, 并为失衡的国家复仇行为背书时, 民众的不安全感便被持续放大。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宣称对加萨实施「[全面封锁](#)」——「断电、断粮、断水、断油」——此举已成为集体惩罚与饥饿战术的象征。 >>

＞ 重现欧洲殖民主义的逻辑

国家复仇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恐怖分子」的污名之上。它作为一种他者化机制，将暴力、野蛮与非理性等特质归因于特定群体，从而使其成为压迫的正当目标。此种机制同时维系着自诩「文明」社会中优越的道德自我形象。由此观之，反恐战争重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逻辑——当时以种族与民族的等级制度为依据，为对殖民地人口实施「文明使命」与压迫统治提供正当性。在此脉络下，约阿夫·加兰特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人兽](#)」的言论，正呼应了殖民企划中典型的去人性化话语。

国家复仇的殖民本质使当代战争沦为满足金融过度积累价值提升需求的工具。污名化他者的论述授权暴力行径，助长对领土与人民的掠夺，其极端形态体现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正激进化[埃兰·卡普兰](#)所指认的贾博廷斯基修正主义殖民军事主义遗产。它挪用宗教与自然法论述来建构犹太人凌驾于阿拉伯人之上的优越性，推动一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彻底封闭平等共存的可能性。此框架使加萨战争得以在种族清洗的指令下实施国家复仇，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铺路。这场暴力服务于解决资本过剩的方案，援引诸如「[无主地](#)」等学说——主张被视为「空置」或「未利用」的土地可供殖民——借此为灭绝与重建正名，从而促成新投资与资产增值。

＞ 领土殖民与军事化积累的交织

据《[富比士](#)》报导，中东局势升级期间，国防类股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受大型军火供应商合约带动，进而重燃军工产业热潮。这种军事化积累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增值相互缠绕。2024年10月底，在轰炸声中，以色列向跨国能源公司颁发地中海油气勘探许可，企图在乌克兰战争加剧的能源危机中将该国打造成天然气枢纽，此现象如[罗宾逊与阮氏](#)所揭示。

此后，领土殖民化、极右翼民族主义与金融过度积累的导流机制已显露交织痕迹。加萨重建计划中，以色列政府提出的《加萨2035》与约瑟夫·佩尔兹曼提交给川普团队的《加萨重建经济计划：BOT模式》皆主张建立国际治理与安全机制，以促进外国投资者对公共资产的私有化进程。

正如[努尔·阿拉菲和曼迪·特纳](#)所指出的，美国计划宣称该地区「不存在财产法」，并以此为基础将其租赁五十年，投资者将获得「加萨地区的股权」，并全面掌控经济、基础建设及行政管理。相较之下，《加萨2035》则将重建与开发加萨能源储备（约122兆立方英尺天然气及17亿桶石油）挂

钩。两项计画皆预设巴勒斯坦人将遭驱离：BOT计画要求加萨「彻底清空」，而以色列方案则构想「从零重建」。两者均提供持续军事力量以确保外部政治控制，并推动符合投资者利益的经济重组。

＞ 在加萨，巴勒斯坦人陷于暴力与经济依赖的夹缝

2025年10月9日第一阶段停火协议达成后，关于加萨重建的争论势必加剧。川普提出的[二十点和平方案](#)主张成立由巴勒斯坦参与的行政机构，表面标榜技术官僚性质，实则政治上服从于由美国总统主持的「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含托尼·布莱尔等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历史推手。该计划承诺俸存巴勒斯坦人将享有「自由离境与返乡」的权利，并推出「激活加萨」经济倡议：此乃吸引投资的早期框架综合体，以「中东蓬勃发展的现代奇蹟城市」为蓝本（第9、10点）。庆祝停火时，[川普](#)宣称：「加萨将逐步重建……该地区蕴藏着惊人财富。」

加萨战争揭示了破坏与重建的纠缠积累如何催生剥夺、金融化与残存民众间的复杂互动。[奥尔瓦·斯维塔特](#)指出，对种族灭绝暴力的抵抗重申了群体或社群与土地的纽带，驱动着反收夺的抗争；而作为殖民技法的「经济价值化」虽促进公民融入，却仅限于分层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体系——这种体系在战后情境下更显歧视性。在重建区域，拆除行动与死亡人数攀升之际，却伴随着经济繁荣的承诺。如此一来，纠缠积累将巴勒斯坦人困于暴力与对重建工程本身的经济依赖之间。■

来信寄至：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iesp.uerj.br>



**GLOBAL
DIALOGUE**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www.isa-sociology.org